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毛里和子的學思歷程：從中國民族問題至亞洲學

Kazuko Mori's Intellectual Evolution: from China's

ethnic problems to Asian Studies

李曉琳

Siao-Lin Li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August, 2013

謝辭



終於到了過去不斷盼望的，得以提筆寫下謝辭的此刻，反而內心千頭萬緒，遲遲不知從何下筆。

首先感謝指導教授石之瑜老師對不才學生的包容，無論是在課堂上的討論或私下的閒聊，老師的靈光一閃往往帶給學生莫大的啟發。在此向老師致上最深的謝意，謝謝您這段時間的教導。也感謝口試委員—邱麗珍老師和邵軒磊老師，還有大綱口試時的口試委員—石原忠浩老師，對本論文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提示寫作方向，使本論文的架構與內容得以更充實完整。

接下來要感謝的是論文寫作途中給予支持、協助的夥伴。感謝佳玲、沛玟和淑媚，妳們在這段期間不斷充當我的情緒垃圾桶，為我打氣。以及感謝工作的同仁，在我論文寫作最忙碌的期間，為我分擔了許多工作。

最後感謝家人的支持與鼓勵，若無家人的支持，攻讀研究所與至日本的交換學生計畫皆無法實現，你們是我精神上最大的後援。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透過深入閱讀日本中國研究者毛里和子的著作、口述歷史訪談以及日本相關研究者的評論等，藉以檢視毛里在其時代背景與學術氛圍下開展的中國研究與亞洲學，觀察當時的社會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其問題意識的形成、中國研究的開展，其中國研究成果又如何影響日後日本的中國研究。

其次觀察毛里的亞洲學如何在整體中國研究學界之環境基礎上開展，在其「現代亞洲學」觀念中，中國的意象與過去研究相比是否有所轉變。另外其特殊的研究關懷為亞洲主體性，主張以「自者研究」取代過去傳統區域研究的「他者研究」，其內涵與意義為何。因此，本文從毛里和子的學思背景出發，依序介紹毛里和子學思歷程的三個重要階段：「從周邊看中國—中國的民族問題、調和論的嘗試—現代中國政治、遭遇亞洲—現代亞洲學」，總結毛里如何回應其面臨的時代脈絡。

關鍵字：毛里和子、知識社群、周邊視角、中國研究、現代亞洲學

Abstract



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thesis is documentary analysis. Through in-depth reading Japan scholar Kazuko Mori’s writings,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nd comments by other Japan scholar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view Mori’s Chinese Studies and “asian-prospective”, with h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academics atmosphere. The thesis observes the prevailing social environment factors how to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her problem awareness, and her research results how to affect the Chinese Studies in Japan.

Another one point is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ri’s “Asian Studies”. Comparing he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with her previous research, try to find China's image has changed or not. And analyze the meaning of her Asia subjectivity, who advocates "selfness studies" instead of “otherness studies”. Mori’s research has three important stages: "from the periphery seeing China — China's ethnic problems", "reconcile the theories — modern Chinese politics", “encounter to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Through these three stages to summary Mori how to respond the context of her era.

Keywords: Kazuko Mori, knowledge community, peripheral vision, Chinese studies,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目次



謝辭.....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iv
圖目次.....	vi
表目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3
第三節 問題意識.....	6
第四節 文獻檢閱.....	8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14
第二章 毛里和子的學思背景.....	17
第一節 毛里和子的生平背景.....	17
第二節 中國研究的學術經歷.....	19
第三節 由對象化中國到自者研究的轉變.....	21
第四節 小節.....	24
第三章 從周邊看中國—中國的民族問題.....	25

第一節 日本學界的民族研究發展.....	25
第二節 研究源起.....	27
第三節 毛里和子的民族問題研究.....	29
第四節 小節.....	42
第四章 調和論的嘗試—現代中國政治.....	45
第一節 理論化的嘗試、宏觀性的探索.....	45
第二節 中國社會主義的轉型.....	49
第三節 亞洲裡的中國—中國研究的亞洲化.....	53
第四節 小節.....	57
第五章 遭遇亞洲—現代亞洲學.....	59
第一節 方法論的反省—現代亞洲學的創生.....	59
第二節 亞洲學脈絡的承轉.....	63
第三節 亞洲框架下的日中關係.....	65
第四節 小節.....	69
第六章 結論.....	72
參考文獻.....	77
附錄一 毛里和子年表.....	85
附錄一 毛里和子著作一覽表.....	87



圖目次

圖 1	中華民族論示意圖.....	38
圖 2	「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組織圖.....	55
圖 3	日中關係的三層結構.....	67
圖 4	毛里和子研究主題歷程圖.....	72



表 目 次

表 1	國民國家類型.....	39
表 2	中國結構變動概念圖.....	47
表 3	「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研究主題.....	56
表 4	現代亞洲學的六大亞洲觀.....	64
表 5	新地域主義比較概念圖.....	65



第一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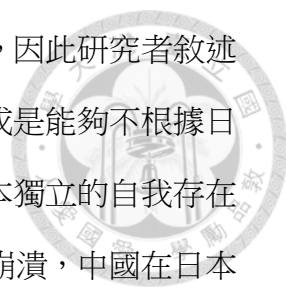
第一節、研究動機



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傳統歷史悠久，其質與量在世界各國中可稱為頂尖。由於日本為中國的近鄰，因此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在江戶時代之前，日本研究中國的學者多著重在儒學的研究，而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對中國觀感也逐漸改變，從過去文化學習對象轉變為文化落後對象，對中國的研究也轉變為地理調查研究，為政府侵略政策服務。根據何培忠的歸納，日本研究中國的時程可分為漢學、支那學、中國研究和中國學研究四個時代(2006：398)。其中第四階段的中國學研究時期，是等到戰後才一點一滴形成的。

在戰後，日本許多學者開始進行對戰前的反省，他們當時論及中國的心態多帶有罪惡感，因此對社會主義中國懷善意，這批左翼學者甚至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革命證明了中國的先進與自主性。但在冷戰期間，由於美國的圍堵政策，使得日本對中國的資訊來源只剩下官方報導，無法取得實證資料。因此回顧 50 年代與 60 年代，當時日本政黨分保守(右派)和革新(左派)兩大陣營，輿論分為接受和敵視社會主義中國兩大觀點，研究人員也分「親中」和「反中」兩大派別(何培忠，2006：419)。尤其面臨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研究人員對文革看法的不同與爭論，使得此分歧與對立更加深化。直到日中關係正常化、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後，日本學者對中國發生的事才開始有實際的接觸與感受。在此之後，日本中國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便越來越多樣化，因此日本中國學的內涵也隨著日本對中國認識的日益豐富而更加多元。

日本中國研究向來與日本主體性的建立有很深的關係，不管在戰前視中國為有待提攜改造的後進國家，或到現在提出的「中國崛起」論，日本都必須處理自己是以什麼身分面對中國的問題，以及應否擺脫日中關係來研究中國的問題。主



體性的建立所指涉的，是日本需不需要透過中國才能認識自己，因此研究者敘述中國的基準可分為二：根據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來認識中國，亦或是能夠不根據日中關係的性質就直接描述中國。此兩種不同的思維，關係到日本獨立的自我存在能否確立。當文革結束，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又適逢冷戰結構崩潰，中國在日本各界觀感中的特殊性與神聖性開始下降，日本乃試圖與中國尋求在客觀平等的某種基礎上對話，在知識界所孕育的這個基礎就是亞洲。(邵軒磊，2009：242)。

於是，日本的中國研究漸漸從過去的中國特殊論，轉變為以區域研究為主，把中國納入亞洲的範疇裡，降低了日本單獨面對中國時中國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神聖性。

本文選擇在這個日本中國研究轉型過程中起主要作用，日本現代中國區域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毛里和子，作為深入研究的對象。早在1996年日本文部省的「重點領域研究」¹項目中，毛里和子擔任「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研究計劃的主持人，此計畫中共有七十餘位中國學家歷時三年，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²研究成果問世後，社會各界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成果是一線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晶，是以實證方法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大膽剖析，也是以歷史為基礎對現代中國社會變化的生動描述。

毛里近期則已經將中國納入亞洲的範疇，其中具有代表的為她在早稻田大學所負責的21世紀COE(Center of Excellenc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計劃。此一研究案在2002年11月開始發展，以「東亞區域化」為核心觀念。本文將透過瞭解毛里和子的中國研究歷程，以及其之後開展的亞洲學對當代日本中國研究產生的意義，來說明當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的轉折與傳承，並對日本如何處理日中關

¹ 所謂「重點研究領域」是指在學術上、社會上有強烈需求的課題，目的是在一定時期內加大研究力度，提高研究水平。重點領域研究課題的年限一般是三年至六年，日本文部省並每年提供5000萬至6億日圓的經費(何培忠，2004：59)。

² 此也是日本中國學研究發展史的一個重大事件，過去文部省主要資助自然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課題很難列入其中。因此「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這項研究課題的通過，不僅表明日本學術界對中國問題的關心，也表明日本社會和日本政府對改革開放後中國巨大變化的高度重視(何培忠，2006：432)。

係以及亞洲課題提供一種理解的角度。



第二節、研究背景

根據毛里和子的研究經歷，她的生涯奠定在兩個大的研究議程上，第一個議程是日本中國學中區域研究的發展，第二個議程則是日本的亞洲論述與亞洲學的發展與其內涵。

壹、日本中國學中的區域研究

戰後日本的區域研究的發展，以研究者是否持有對戰爭的贖罪意識與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場，可概分為兩種不同的路徑。其一以中國研究所³為代表，主要成員為平野義太郎及石濱知行等具有贖罪意識的中國研究者，以革命史觀⁴為中心開展中國研究。(邵軒磊，2009:96)第二種途徑延續了戰前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⁵、東亞研究所⁶等國策機構的傳統，如1953年成立的亞細亞政經學會受到政府資助，具有明顯的國策研究指向要素。(陳綺齡、邵軒磊，2011:71)而由政府直接成立的研究機構包含通產省的亞細亞經濟研究所(以下簡稱亞經研)與外務省所轄財團法人國際問題研究所(以下簡稱國問研)。這些官方機構受到美式區域研究觀念的影響，主張以客觀科學、價值中立的態度進行區域比較研究。

³ 1946年10月中國研究所開始正式運作，該所的核心宗旨為「面向中國」，基本的方針有：對現代中國真實把握為目的之「綜合研究」、以現代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研究」、外國的現代中國研究的調查、關於日本中國調查研究及其檢討、亞洲諸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研究、有關日中貿易的調查研究(邵軒磊，2009:96-97)。

⁴ 革命史觀從1949年直到1970年代為止，一直是日本中國研究的核心方法論。其意味著將中國社會各階段依照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分析，說明中國的歷史方向。中國到清朝為止是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是半封建社會，而之後的中國人民共和國為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論為中心，將中國發展進程等同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史觀(邵軒磊，2007:117-118)。

⁵ 滿鐵的調查部在日本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占有一定位置。滿鐵成立於1906年，是日本通過日俄戰爭搶奪了經營中國東北鐵道運輸等權利後成立的公司。雖是民營公司，但日本政府對該公司有一定的影響力，使該公司成為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政策中心」。滿鐵在首任總裁後藤新平主張對中國實施「文裝武備」下，於1907年成立了調查部(何培忠，2006:409-410)。

⁶ 東亞研究所於1938年成立，該研究所是日本政府為推行侵略戰爭政策，對中國以及亞洲地區的人文和自然環境進行調查研究的機構(何培忠，2006:410)。

在戰後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思潮的背景下，這種帶有美國色彩的現代中國研究，提供了日本非馬克思主義者另一種選擇。雖然此時日本的中國研究以革命史觀為主流論述，但美式價值已漸漸穿透到中國研究社群中，甚至在社會主義史觀式微後，更成為主流的研究方法(邵軒磊，2009：126)。但同時美式區域研究方法也受到許多學者的批判⁷，從中可看出日本學術界對於自身主體性的焦慮。

1970 年代開始，由於對中國文革的失望，革命史觀開始退潮，「中國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觀點開始興起。因此在 1970 年之後，中國研究的「政治」傾向消失，開始把中國當成「追求利益的普通民族國家」，如同回到區域研究的基礎上。此時日本對中國研究的視角不再將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從普通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國際關係區域研究)；中國有特殊文明(傳統帝國論、東方特殊論)；中國有各種區域(中央/地方關係研究)等以往較少見的研究視角切入中國。(邵軒磊，2009)。

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日中關係正常化、中美友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並開始進入國際社會等，使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的日本研究界面臨重大變動。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遍及日本中國學研究各個層面，現代中國研究領域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自此之後，日本學者可以到中國進行實地調查，區域研究躍為主流，於 1980 年代初開始形成知識體系與方法論的多元化，接納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文化人類學、民族主義等其他人文學科成為重要方法論來源。在這個過程中，濱下武志發表了朝貢體系論⁸，是區域研究與亞洲學走向結合的先聲，其研究對象(亞洲作為一個區域)與研究主題

⁷ 如 1962 年發生的福特基金會事件，指的是「在 1962 年 1 月到 7 月左右，在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之間，發起了對於美國的亞細亞財團和福特財團的現代中國研究計畫的暴露與批判運動。」其中，福特財團主要是針對東洋文庫(中國研究部分)，而亞細亞財團主要針對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亞洲發展中國家及東南亞部分)鉅額補助，因此日本學者稱其為「AF 事件」(邵軒磊，2009:137)。

⁸ 在濱下武志的亞洲觀中，突破了以「全體主義」或是「北京中心」的方式來看中國，主張以經濟體為單位，從研究中國的部分出發。這樣的主張不僅開啟了一系列關於中國以區域為核心的城市研究主題，同時也在問題意識上，將中國研究導向更多面向(衛生、社會群體、金融系統等等)。(邵軒磊，2008：109)。

(加入過去少有的低政治議題，如衛生、貿易)也產生轉變。



貳、日本亞洲學的發展

戰前日本的亞洲研究以中國研究為主，在形式上以區域研究為核心認識方法，並結合實證研究。但在後藤新平建置滿鐵後，日本的亞洲研究進一步轉變為「殖民研究」。在 1941 年進入戰時體制後，亞洲學隨著戰爭的進行而蓬勃發展，慣行調查⁹成為發展重心。此時由於研究者在思想上受到軍政府箝制，實證主義意義的研究已消失。(邵軒磊，2009，249-255)

二戰後，日本的亞洲研究對過去殖民主義和侵略進行反省，同時又受到以美軍為主的占領政策影響，因此試圖把原來做為大東亞的亞洲意象轉變為分割成各個民族國家的，作為獨立與革命主體的亞洲意象。一方面學者很自覺地對亞洲民族主義產生共鳴，另一方面受到冷戰下東西對立格局的影響，亞洲的意義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下被轉變為「遠東」或「亞太」的地緣戰略概念。(馬場公彥，2004：77)。

但隨著反美浪潮的興起，特別是在 1962 年的福特基金會事件中，日本學界開始意識到日本對於亞洲的責任，亞洲價值重新被提出，日本學者也相繼站在亞洲位置之上，提出對西方的批判。但是在這其中，日本並非正面面對西方，而是將自己併入「亞洲/中國」之中。(邵軒磊，2009，252)。此時的亞洲觀還是價值或道德上的弱勢，但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日本社會漸漸願意表達自身的亞洲個性。在馬克思主義退潮後，「亞洲」思維便擺脫象徵負面價值的陰影，發展出具有能動性的立場。其結果，在 1980 年代中期，亞洲學與日本主體意識一起復興。(邵軒磊，2009，262)特別自 1980 年代起，面臨國際情勢劇烈的改變

⁹「慣行」與「慣習」都是指舊有的風俗習慣，如土地交易、親屬關係、財產繼承等民間慣例。所謂的「慣行調查」是調查構成當地固有習俗、法制的舊有習慣，此調查目的為取得統治新領土的基礎。

與東亞價值的重組，日本知識界開始高度重視亞洲的研究，出現了「新亞洲學」或「現代亞洲學」的說法。所謂新亞洲學或現代亞洲學，試圖與過去日本的「亞洲研究」做出區分。日本過去的亞洲研究著重研究亞洲各國的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社會傳統等，是在「歐美文化先進」、「日本文化先進」的理念下開展研究，預設了亞洲的後進性。與此相對，「新亞洲學」則是以東亞為中心，在經濟、國際安全、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討亞洲地區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等問題(何培忠，2004b：91)。

2002 年，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早稻田大學成立了「創建現代亞洲學基地」，從而大大推動了新亞洲學的發展。新亞洲學研究大體涵蓋三個方面：(1) 跨學科的亞洲研究；(2) 比較亞洲研究；(3) 亞洲共同體研究。其中跨學科的亞洲研究是運用政治學、經濟學、區域研究、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知識以及學科間相互的關係，對亞洲地區複雜的現象進行觀察和分析，探討研究亞洲問題的有效方法。至於比較亞洲研究，其目的是探討亞洲的多樣性和共同點，構建新亞洲學的理論。最後是亞洲共同體研究，則是探討亞洲地區的相互合作以及區域聯合的問題，從學術上探討構建亞洲共同體的可能性和方法以及日本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何培忠，2004b：91)。

毛里即是在區域研究與新亞洲學的背景脈絡下進行中國研究，她從 1970 年代就已經開始以美式區域研究方法研究中國，最初從研究民族政策問題，逐漸延伸到其他政治議題，是日本現今現代中國區域研究的代表研究者。

第三節、問題意識

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是檢視毛里和子在其時代背景與學術氛圍下開展的中國研究與亞洲學，觀察當時的社會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其問題意識的形成、中國研究的開展，她的中國研究成果又如何影響日後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其次為觀察毛里的亞洲學如何在她之前中國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在她的亞洲學中，中國的意象與

過去研究相比是否有所轉變。另外毛里和子似乎對亞洲的主體性特別關注，主張以「自者研究」取代過去傳統區域研究的「他者研究」，另一個觀察重點即為她設計出的「自者研究」的途徑內涵與意義。



壹、作為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

透過之前在區域研究和新亞洲學的脈絡下梳理毛里和子的研究，可發現毛里是以美式區域研究與新亞洲學構成思考框架：一方面中國是普通國家，但另一方面中國則是亞洲的一部分。在 70 年代革命史觀逐漸衰退後，將中國視為「現實集權主義國家」的觀點成為主流。在毛里和子所編的《現代中國論》套書中，已經不試圖找出「全體理論」，而是對中國的各個層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其中毛里的文章「中国の改革とシステム変容」，從中國作為「集權主義國家」的假設出發，加入比較社會主義國家與比較國民黨的方式，把中共從社會主義陣營中分離(邵軒磊，2009：236-237)。以此書為分期點，此後日本的中國研究界，在社會主義國家途徑無法發展的情況下，幾乎捨棄了從社會主義國家模式出發的視角，而提倡田野調查的方法論。毛里雖主張將中國對象化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但她也承認當前的社會科學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的全貌，仍有許多理論、研究方法待建立，因此需運用多元、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貳、作為「自者研究」的亞洲學

關於毛里提出的「現代亞洲學」內涵，其主要的亞洲觀內涵繼受了濱下武志的體系論，強調國際移動；也繼受了戰前的區域研究，強調實態調查；更繼受了國策研究傳統。(邵軒磊，2009：262)。

毛里指出過去的世界體系論或依賴理論，其立基於歐洲起源世界系統的一體性與冷戰時期東西兩陣營的對立，因此中心與邊陲為固定的狀態，而且以明確的疆界存在作為前提，將區域空間區塊(block)化。但是對在各方面都急速全球化以

及區域化的東亞而言，區域與自身的境界漸漸不明確，過去以中心與疆界固定為前提的網絡(network)分析法完全無法掌握，故開發出新的區域系統分析成為新的重要課題。於是新亞洲學的出發點為：(1)在進入 21 世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亞洲諸國開始自發的欲求亞細亞作為一個全體性區域，因此需要開發分析「一體的亞洲」的學問。(2)不採取「他者研究」方式，不清楚劃分研究側與被研究側，而是採取「自者研究」立場。(3)亞洲成員有共同的歷史、目標與課題¹⁰(毛里和子，2007a：41-51)。這種強調自者研究的新亞洲學，引導研究者在情感上與研究對象之間形成聯繫，與區域研究要求情感中立頗為不同。

本文將觀察毛里在重要事件時的立場，她自認所進行的研究對「當時」日本有何意義，在重要論爭時的介入角度，參與重要學會與當時主要研究取向的互動，以及她在方法論與研究視角上的轉變，並藉由訪談來印證本文建立的架構。因此將透過作為研究方法的系譜學，在縱向上觀察她師承何種思想，在橫向上與誰對話，是否有過論爭。即為整理出她學術經歷的共時性與歷史性，觀察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她的研究，而她的研究又對中國研究社群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即希望透過分析毛里和子研究，梳理出她在日本中國學系譜的定位以及其背後的社會環境因素對她研究的影響。

第四節、文獻檢閱

壹、學者生平

毛里和子出生於 1940 年，由於父親為台灣帝國大學的老師，在 6、7 歲以前曾在台灣生活。1958 年毛里進御茶水女子大學就讀，一開始想進法學部，但由於父母的反對，所以只好選擇歷史學為主修。她於訪談¹¹中自承，由於 1956 至

¹⁰ 對抗歐美或是被歐美支配的歷史、追趕歐美、脫離後進的目標、利用民族與區域主義對應全球化的影響。

¹¹ 2008 年 4 月 18、23 日由川島真對毛里和子進行的訪談。

1958年的中國對日本而言是非常新穎特別的存在，因此對中國近代史產生興趣。在毛里的大學階段適逢日本學生運動與反美鬥爭興盛的時期，青年時期的毛里也投身運動之中。在大學期間，毛里擔任生協設立委員會(全國大學協同生活組合連合會)的準備委員長，也參與了安保鬥爭¹²，毛里認為安保鬥爭讓他學習到不少實踐政治學的經驗¹³。

毛里自大學畢業後至 1987 年於國問研就職，一開始擔任編集中國關係資料集的助手，其間在 1965 年獲得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學位，後來升為主任研究員。從 1981 至 1983 年，毛里在上海日本國總領事館擔任專門調查員，當時的研究主題為中國勞工的勞動力與失業問題，毛里認為當時現地研究的經驗帶給她在中國研究上很大的突破。在 1986 至 1989 年期間，毛里參加了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的調查計畫，與中國學者費孝通合作，在江蘇等地進行了小城鎮建設的調查。1987 年她到靜岡縣立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部擔任教職，在 1994 年轉任至橫濱市立大學的國際文化學部，後在 1999 年轉任至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當時早稻田的政治經濟學部並沒有專任的現代中國政治研究者，但當毛里轉任至早稻田後，早稻田的政經學部與政治學研究科，一躍成為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中心(平野健一郎，2007：23)。之後毛里於 2002 年創立了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亞洲學研究院，並決定在 2004 年獲得早稻田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

貳、著作檢閱

毛里雖為史學出身，但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國問研訓練的影響較深，認為中國

¹²所謂的安保鬥爭，指的是日本社會在戰後的大規模反戰群眾運動，起因為 1960 年 1 月 19 日岸信介前往美國簽訂安保條約。新的「日美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條約」與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相比，雖增強了日美關係的對等性，但新條約的適用區域問題擴大了日本捲入戰爭的危險性。自日美開始修約談判起，日本國民就掀起了戰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即安保鬥爭，此也被視為日本革新(左派)與保守(右派)兩派的大鬥爭。

¹³毛里認為安保鬥爭世代可分為三個類型：1.共產黨；2.激進左派；3.民主派。自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自己當時的立場於激進左派與民主派之間。

研究應將中國對象化並還原為社會科學，中國式的體制也應該對象化為政治學的一部份。並認為現代史的問題只能用社會科學的方式解明，而歷史學無法解決。觀察毛里的研究與著作，可發現其中研究主題相當廣泛，從中國政治體制、民族政策、中蘇關係、日中關係到亞洲學研究都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大體而言這些研究議題的轉變，是從中國的內部研究到日中關係，發展至現代亞洲學與東亞共同體研究。

在國問研擔任研究員時期，毛里主要是負責中國共產黨史資料研究，但他並不只關注於當時中國政治研究的主流議題，也關注了中國的邊境以及當地的少數民族、蒙古、中蘇關係等當時並非主流議題。毛里最初發表的研究成果為 1989 年出版的《中国とソ連》，之後他以周邊照射中心的中國政治論進行中國研究。毛里的主要著作《周縁からの中国》於 1998 年出版，以及 1993 年出版的《現代中国政治》(2004 年改版)，此兩本著作強調客觀性並透過社會科學理論以對象化中國，確立了毛里在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地位。而在 1996 至 1998 年進行的「現代中国の構造變動」大型研究計畫，毛里作為總括負責人，當時他統率研究組織的優異手腕，更加確立其在學界的地位(平野健一郎，2007：23-26)。

毛里主要著作《現代中國政治》此書，代表著日本新中國觀的展現與現代中國學的確立。對毛里而言，從她這個世代開始是與中國沒有因緣的世代¹⁴，並開始與傳統日本東洋學斷絕。透過將中國對象化，日本已可從自身認同中，將中國解放出來。此書採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希望現代中國研究能與其他領域研究者對話。毛里在一次訪談中指出，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是從美國式民主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角度觀察中國，缺乏客觀性(何培忠，2004a：59)。類似的評論也可在此書中看到，毛里指出民主主義的陷阱—「西方定義下的民主主義」測量方式是有風險的，可能造成錯誤認識。市場化與民主化是西方價值與目標，但對中國而言這並不是自明的道理，故其發展過程也不需要一樣。在包括中國的東亞比較政

¹⁴ 此指對中國幾乎沒有抱持侵略或根深的日中文化(如同文同種)的心態。

治中，如果以歐美民主主義為測量基準，將造成東亞政治分析中，將國家貼上「無自由的民主主義」、「準民主主義」或是「有缺陷的民主主義」的標籤。毛里認為民主主義是普遍的理念，但是民主主義的制度與體制可有不同的具體形式。

毛里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周縁からの中国》，同時為她的博士論文，是第一本對現代中國的民族與民族問題進行一個全體、體系性考察的著作。過去的研究多為以文化人類學對各個少數民族進行研究，而此書對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之內容與變化、及其與少數民族之關係多所著墨，並加入國際關係視角及體系性的研究。特別是對從清朝後期開始，經歷中華民國到現代中國的邊境政策與民族政策進行體系性的敘述與分析。其研究方法以區域研究為主，加入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並強調從「周縁」到「中心」的照射視角。書中指出民族(nation、ethnic group)是歷史流動的存在，且在中國此一傾向特別強。她主張民族是可被人為形成的，對中國而言民族不是客觀的存在，是可塑造的，是由上而下的「國民形成」。她指出，在「民族平等」的口號下，沒有考慮各民族間的巨大差異，使得像蒙古和只有數千人的西南少數民族是同等對待，這是造成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源之一。加上經濟市場化後，少數民族受「漢化」引起了自身民族生存與認同的危機感，因此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與人權或民主並無直接關連。

於 2000 年前後，毛里漸漸把目光轉到日中關係上，此與當時日中關係結構性問題的浮現有很大的關連，特別是 2005 年春天反日運動的爆發，更是促成毛里寫下《日中關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此書，進行對日中關係的反省。書中指出，1972 年日中國交正常化的決策過程遺留下許多問題至今仍無法解決。此書也比較了兩國亞洲意識的差異，毛里認為日本從戰前脫亞入歐，到戰後脫亞入美，因而喪失了亞洲認同感。日人雖意識到自己身在亞洲，但對自身是亞洲人的意識有限。而中國的亞洲意識(特別是東亞意識)，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由於過去傳統中華的思考模式(朝貢體系)與大陸國家的習性，中國仍將東亞各國視為自己的「周邊」，而非將亞洲視為一個包含中國的區域。毛里認為未來日中兩國關

係改善的方式，癥結在於將爭取國家利益的思維轉變為爭取「區域利益」，因此「東亞共同體」的創立有其必要性。但毛里也指出「東亞」對日本與對中國的意義是非對稱性的。對政治非全球化的日本而言，東亞幾乎是日本唯一需處理的區域；但對中國而言，東亞雖然重要，但也只是其周邊地域之一而已，而且仍有許多其他問題阻礙著共同體的形成¹⁵(毛里和子，2004b：233)。

毛里於 2002 年創建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亞洲學研究院，同年 11 月擔任研究據點領導，開始發展 21 世紀 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的研究案，目標為超越以往出自歐美的社會科學，創造新的「一體的亞洲」¹⁶的論點。此計畫於 2007 年 3 月完成，以毛里為編集代表，於 2006 至 2007 年出版《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共四冊¹⁷，在事後獲得極高評價。

從區域研究到創立現代亞洲學的契機為，2001 年發生的 911 事件以及之後美國的回應方式。過去區域研究以美國對非西歐世界的戰略研究為出發點，完全缺乏對他者的理解或與他者共存的認識，幾乎是以推廣自身的國家戰略以及美國文明觀為目的。以致所使用的傳統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生態學理論，事實上為「歐洲學」，從而產生了學科中視東方為異類，有待改造的所謂「東方主義」化的疑惑。因此，與歐美視點相對化便成為現代亞洲學的主要課題，主張「透過『從亞洲內部的觀察』之累積，開發出『不斷生成的亞洲』的『內部方法論』」。(堀内賢志，2007：90-91)。這也就是進行非他者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嘗試以自者研究的立場，開發出從亞洲中探索亞洲的途徑(approach)。

毛里自 2007 年開始「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現代中国地域研究拠点プログラム)，整理出中國研究的四種模式：(1)通常的現代化模式；(2)回歸傳統

¹⁵ 毛里認為主要的妨礙因素如下：(1)近代歷史問題造成的相互不信與猜疑；(2)近代東亞各國共有的強烈民族主義，造成東亞的割裂；(3)此地域的國家，其經濟、政治、軍事或影響力有很明顯的差距(非對稱性)(2005：1-5)。

¹⁶ 從過去「亞洲乃一體」(アジアが一つ)，轉變為以機能面為主的「一體的亞洲」(一つのアジア)。

¹⁷ 此系列書中所指的「東亞」為東北亞與東南亞結合的區域，具體而言為 AESAN+日中韓。

的模式；(3)東亞模式；(4)「中國就是中國」模式。毛里認為東亞模式視為中國的目標模式觀點還是有用的，至於第四種模式仍有許多理論、研究方法待建立。

毛里認為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研究對日本的社會科學來說是「命中註定之事」。但在訪談中毛里也表達了對當前日本中國研究的憂心，由於現在是脫價值的時代，在此意義下年輕研究者較缺乏內在動機(石之瑜等編，2011:334)。而且自 1990 年代以後，中國越來越像「普通國家」，與日本在許多方面逐漸接近，使得一些人對中國的興趣降低(何培忠，2004a：58；2006：416)。

參、學術社群的定位—現代主義者

何培忠主編的《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2006)廣泛介紹了日本、美國、歐洲、澳洲等國的中國學的發展過程與研究趨勢，但由於其為概論性質，研究觸角廣但不深入。邵軒磊在《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一書(2009)，雖深入探索自戰前至 21 世紀的日本的中國研究系譜，但由於關注的是整體學術社群發展變化，對單一學者在系譜上的位置與意義論述較少。因此上述著作對於描繪特定研究者在學術社群的位置略有不足，為一窺毛里在日本中國學界的位置，在此以毛里與另一日本中國研究者(中國文學、現代中國社會)竹內實於 2001 年在《世界》(岩波書店上)的對談，藉以標示出毛里在學術社群的位置。

由兩者間的對談，可清晰觀察到雙方由於世代與學門間的差異導致對中國認識的分歧。竹內實於 1923 年在中國山東省出生，直到戰後返日，並在京都大學文學部專攻中國語學文學，之後至東京大學攻讀研究所，開啟了中國研究之路。與竹內實屬於「與中國有關係」的世代不同，毛里在 1940 年出生，與中國沒有特殊關係與情感，在研究上得以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另一方面，雙方雖都出身自文史學科，但與竹內實的文史研究不同，主要影響毛里的研究方法、研究取向是來自於國問研 20 餘年的任職經驗，強調進行社會科學的客觀研究。

這些差異體現於雙方對特定議題的看法，竹內認為中華思想是實存的，毛里認為其只是幻影；竹內認為存在著「亞洲式價值觀」，而毛里不認同「亞洲式價值」，認為其不具備政治的普遍性。毛里以國際情勢分析中國政策的轉變，認為中國由 50~60 年代與國際體系的對抗，至 80 年代開始轉變為順應國際體系；而竹內不以國際體系視角觀察中國，而是透過分析政治菁英的言論，認為不論是社會主義的選擇或是外交政策的轉向，都是中國菁英在面臨自身課題而做出的選擇(竹內実、毛里和子，2001)關於這些分歧，竹內評論毛里是現代主義者(竹內実、毛里和子，2001:77)，而毛里也自承「被學生們稱為道地的現代主義者」，認為「從根本上存在著發展史觀」、「(民主)作為次善的東西，在當今時代還是應該加以維護的價值。」，指出在中國近代主義沒有完全紮根，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雖「看似成為現代主義者.....,在談論中國或近代史時，他們會輕易回到傳統上，而我則不想那樣。」(石之瑜等編，2011:335-336,340)

由以上可看出晚近毛里的研究特色為，主張以多種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而不試圖找出「全體理論」；以及以東亞模式貫穿研究主題，強調要建立亞洲視點，而非完全接受歐美視點。毛里所開展的中國研究的確有其特別之處，開啟了新的研究視角，並進而擴展到亞洲研究，在現在的學術界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以下本研究將深入探討毛里對中國的分析方式，並且試圖探循這樣的分析方式對於理解中國有著什麼樣的影響。並檢視毛里提倡的新亞洲學與過往的亞洲學有何根本上的差異，以及她如何處理在亞洲的基礎上，日中兩國的角色定位。最後分析她在研究議題上從「中國→亞洲」，在研究方法上從「區域研究→現代亞洲學」的轉變過程，並探討促成此轉換的社會背景。

第五節、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蒐集並整理毛里和子的論著作為原始文獻，將毛里放置於時代脈絡下，觀察社會背景因素如何影響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的選擇，並進一步去思考其問題意識形成的時代背景為何，甚而從字裡行間

中推測作者如何回應當代流行的問題意識 (石之瑜, 2003)。另一方面, 透過其他日本學者與毛里的訪談、對話, 對毛里著作的評論等, 補充對毛里的認識並藉以描繪出她所屬的知識社群, 以及研究該社群的研究狀況、影響力與曾經出現過怎樣的爭議與討論, 並且進一步了解毛里和子在該社群中的位置與影響力。

本研究即試圖審視身為研究者的毛里和子, 其所處的心理與社會背景如何影響到對中國的觀察, 又如何影響她在日本中國研究中的位置, 而她的中國研究和其他人有何異同? 從而掌握她所屬的知識社群的文化、歷史脈絡以及所處的當代情境, 對她的中國認識具有什麼意義?

在章節安排上, 本文共分五個章節, 在不同研究課題下(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現代中國政治、亞洲學的建構), 檢視毛里和子的中國認識與亞洲認識的經緯與之間的關聯性。

第一章為緒論, 說明研究動機、研究背景、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以及簡介毛里和子的生平、著作與日本相關中國研究者對她的評論。

第二章以毛里和子的學思歷程為主軸, 探求其開啟中國研究的淵源。本章透過梳理毛里的求學與接受學術訓練的過程, 釐清時代背景與研究機構因素如何影響毛里的中國研究, 特別是研究方法與研究課題的選擇。

第三章開始分析毛里和子的中國研究, 以毛里對中共民族政策之研究為核心, 首先探討毛里的研究源起, 問題意識的形成、研究方法與視角的選擇, 以及民族研究日後如何影響毛里後續的中國研究。在此先說明毛里對於民族問題研究的代表作《周縁からの中国》(1998)的出版雖晚於毛里另一著作《現代中國政治》(1993), 但基於前書的調查資料源於毛里1986及1989年在中國的現地調查成果, 及毛里貫徹的研究視角—周邊照射中心的概念於「オウエン・ラティモア考(1)」(1979)一文即提出, 因此本文將毛里的民族問題研究置於中國政治研究之前探討。

第四章以毛里的《現代中國政治》一書與「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為核心, 檢視毛里提出的中國研究途徑與模式如何應用到其研究課題, 將中國對象

化，以及比較研究中「社會主義中國」至「亞洲裡的中國」參照系的轉化過程。

第五章主要探討毛里和子提出的「現代亞洲學」內涵，描述從舊亞洲學、新亞洲學到東亞整合論的發展過程，以及新舊亞洲學內涵的比較。並檢視毛里對日中關係的看法，包括日中關係問題結構性因素的探討以及未來兩國如何在後冷戰世界體系下進行合作，並進一步探究毛里如何將日中關係規範至亞洲框架下，如何定位中國與日本在東亞共同體中的角色。

第六章為結論。整合以上四章的討論與分析，藉由檢視毛里和子的學思經歷、中國研究與亞洲學研究的經緯，總結毛里和子的中國認識和亞洲觀，並嘗試界定毛里在當代日本中國研究系譜中的位置。

第貳章 毛里和子的學思背景

本章將透過檢視毛里的生平背景與學思歷程，觀察當時日本的社會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其問題意識的形成與中國研究的開展，並嘗試探討毛里在日本中國學界的定位。

第一節 毛里和子的生平背景¹⁸

毛里和子出生於 1940 年，由於父親為台灣帝國大學的老師，在 6 歲以前曾在台灣台北生活。1958 年，毛里進御茶水女子大學就讀。在當時，女性就職受到很多社會限制，一開始毛里提出想要進入法學部，成為律師，但遭到熊本前士族之父親的反對。當她再提出想要學習歷史後，父親的回覆是「女孩子就是要結婚，沒聽過要學歷史的。去學家政或英文吧。」（毛里和子，2003：74）但最後毛里仍不顧雙親的反對選擇歷史學科，並學習中國現代史。

毛里進入中國研究領域的契機，是對 1956 至 1958 年的中國大陸變化發生興趣。對當時日本社會而言，革命後的「新中國」是非常耀眼的時代，所謂的現代史自然成為中國革命史。加上毛里當時讀了 Edgar Snow 的著作—《西行漫記》（The Red Star over China），更堅定了其觀察中國的現代史的決心。

此外，當時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由於資訊的缺乏，反而充滿神秘色彩。毛里表示特別喜愛神秘事件，舉出三區革命時期發生的墜機事件¹⁹，指出由於事件

¹⁸ 此節多整理自毛里本人之口述歷史(石之瑜等編, 2011,《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口述知識史》)及毛里於 2012 年 7 月 27 日在「中國研究的口述知識史工作坊——東南亞與日本」的演講「我的中國研究—三個挑戰」。

¹⁹ 三區革命又稱伊寧事變或三區叛亂，指的是 1944 年在中國新疆北部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區爆發的大規模反政府叛亂，並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此次事件背後明顯有蘇聯的介入，國民政府也屢次試圖跟蘇聯交涉。之後在國民政府、蘇聯和三區代表間的談判後，在 1946 年 4 月制定了十一條和平條款，取消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名稱，恢復三區的建制，後成立新疆省民主聯合政府。在 1949 年，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與阿合買提江為首等聯合政府的成員組成代表團，在搭機前往北平參加中共政治協商會議時，途中在伊爾庫茨克附近失事，代表團成員全部罹難。事故原因至今不明。

的相關資料都未公開，只能從新聞報導略窺事件的一角。(毛里和子，2002:276)但正由於如此，反而更有挖掘出真相的動機，這種解謎的心態也帶給毛里在中國研究上不斷從文獻挖掘資訊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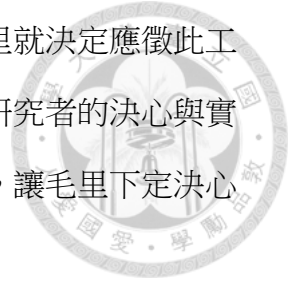
在毛里的大學階段，發生不少日本學生運動與反美鬥爭，青年時期的毛里也投身運動之中。在大學期間，毛里擔任全國大學協同生活組合連合會（生協）設立委員會的準備委員長，也參與過安保鬥爭。她回想起來，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大躍進運動以及毛澤東的革命浪漫主義熱潮。而在日本，年輕人也是熱情的呼喊著「歷史由我們自己的手來開創」。

在學校學習時發現，不論是研究現代或近代，當時的歷史學研究方法除了實證主義外並沒有其他選擇。毛里在當時無法理解這種方式，但是回想起來，毛里體悟到，與古代史或中世紀史不同，研究現代史時，必須從無數的資料與事實中選擇出有意義的材料後，再加以分析。因此，政治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訓練是不可欠缺的。但毛里的母校(御茶水女子大學)並沒有法學或政治學的專門學科。因此關於政治學方面的知識，毛里自承並非在學校學習，而是在安保示威集會以及參加同伴的研究會的過程中學習。毛里認為安保鬥爭雖然讓她學習到不少實踐政治學的經驗，但這種「政治學」就是非常主觀的，距離所謂的「學問」相當遙遠，因此在之後重新的學習也非常的辛苦。

毛里以浙江財閥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作為大學的畢業論文題目，並獲得宇野重昭的肯定，其論文的突破是對陳伯達的「四大家族論」²⁰的質疑。關於畢業後的出路，雖然朋友多進入研究所，但毛里選擇先就業，先後應徵了亞經研與國問研。一開始雖先應徵亞經研，但被告知女性只能被錄取成為事務員，無法成為研究員，因此只能放棄。之後國問研為了製作中國關係的資料集，而來到御茶水

²⁰ 當時中國的正統史學對蔣介石政權持以非常否定的態度，認為其是官僚的，為外國帝國主義服務的。而陳伯達的「四大家族論」即是以 1927、28 年蔣介石與浙江財閥的關係為出發點，此四大家族指蔣介石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與陳果夫、陳立夫家族。陳伯達指出四大家族借由抗戰名義積聚了 200 億美元的財富，但此論述缺乏足夠證據，現今已很少出現。

女子大學招募助理。由於當時同學多已決定就職出路，因此毛里就決定應徵此工作而進入國問研。在國問研的10年助手經驗，讓毛里有了成為研究者的決心與實力，隨後，80年代初期在上海擔任總理事館專門調查員的經驗，讓毛里下定決心成為現代中國研究者。



第二節 中國研究的學術經歷

毛里自大學畢業後至 1987 年於國問研就職，總計 20 餘年，可說是研究者養成的黃金時期。毛里一開始擔任日本外務省委託製作《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1921~1945 年)與《新中國資料集成》(1945~1958 年)的編輯助理，由於此計畫，國問研內部組成一個研究會，其中請到宇野重昭來主持此共產國際的研究會，並為成員講解。毛里自承其實際學問養成是由宇野重昭和山極晃兩位學者的指導而來，並且這種直接閱讀大量原始資料的經驗帶給她之後研究很大的幫助。之後在 1965 年獲得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學位²¹，後來升為主任研究員。從 1981 至 1983 年，毛里在上海日本國總領事館擔任專門調查員，當時的研究主題為中國勞工的勞動力與失業問題，毛里認為當時田野研究的經驗帶給她在中國研究上很大的突破。在 1986 至 1989 年期間，毛里參加了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的調查計畫，與中國學者費孝通合作，在江蘇等地進行了小城鎮建設的調查。

在國問研時期，毛里被指派負責刊物的編輯與出版，及研究專案之申請計畫書的編寫等行政工作，此期間累積的統籌、協調等行政經驗與人脈，在毛里轉任至大學後，對其申請研究計畫有非常大的幫助，如毛里相繼在 1996 年與 2002 年接下大型研究案，文部省科學研究費重點領域研究「現代中國構造變動」與 21 世紀 COE「現代亞洲學的創生」。值得一提的是重點領域研究計畫，一開始並不是由毛里主動提出，而是文部省主動告知毛里相關的內容及其範圍，表示中國非常重

²¹ 毛里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北伐末期時武漢國民政府成立過程之探討。有趣的是毛里在大學的畢業論文和碩士論文選擇的研究主題都是關於民國時期國民黨(蔣介石與汪精衛)政權的探討，但在之後，毛里的研究幾乎都聚焦於 1949 年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詢問能否設計相關課題(石之瑜等編，2011:312)，此若干反映了毛里的中國研究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此外基於機構性質對等，國問研與中國外交部下屬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自80年代起開始舉辦常規的日中兩國研究者論壇，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人員多會成為外交官，所以對毛里而言是直接接觸中國窗口，有益於瞭解當時中國對外政策的管道。(石之瑜等編，2011:309)

1987年她到靜岡縣立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部擔任教職，在1994年轉任至橫濱市立大學的國際文化學部，後在1999年因應國際政治學者山本武彥之邀，轉任至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並於2010年退休。當時早稻田的政治經濟學部並沒有專任的現代中國政治研究者，毛里成為該校125年歷史上的第1位女教師，第1位中國研究者，也是第1位區域研究的授課老師。以當時女性教授仍相對少數的情形之下²²，毛里的成就十分值得一記。當毛里轉任至早稻田後，早稻田的政經學部與政治學研究科，被認為是日本現代中國研究之核心機構(平野健一郎，2007:23)。之後毛里於2002年創立了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亞洲學研究院，並決定在2004年獲得早稻田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

毛里豐富與紮實的研究成果有著相當高的評價，也獲頒眾多學術獎章。毛里在1995年以《現代中國政治》獲得每日新聞社「アジア太平洋賞大賞」、1999年以《周縁からの中国》獲得大平正芳紀念財團的「大平正芳賞」、2003年由於對區域研究的貢獻獲得紫綬褒章、2006年以《新版・現代中國政治》獲得櫻田會的「特別功勞賞」、2007年7月由於對現代亞洲學的建構之貢獻，獲得大同生命國際文化基金「第22回地域研究賞」、同年10月以《日中關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獲得石橋湛山紀念財團「第28回石橋湛山賞」、2010年獲得「福岡亞洲文化賞學術研究賞」以及世界中國學論壇頒發的「中國學研究貢獻獎」、2011年獲得由日本文部科學省頒發的「文化功勞者」獎。這些獎章彰顯了毛里的研究成果與

²²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學校基本調査」，以2000年度調查結果為例，該年度擔任大學教授職共有58,137人，其中女性教授占不到1/10，總計4,595人。

貢獻廣受外界的肯定。

關於毛里研究主題的轉變，起初毛里在編輯中國相關資料集期間，由於長期涉獵第一手的資料，早期文章著重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主要集中在中共建國之前的發展，尤其是國共蘇之間的關係。至 1975 年，共同編修的「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完成後，適逢中美關係正常化與中日建交，毛里的研究目光也轉向中國外交關係，特別是中美、中蘇關係與中國東協關係。1981 至 1983 年，毛里赴上海日本國總理事務館擔任專門調查員，當時研究主題為中國勞工的勞動力與失業問題。80 年代毛里的研究主題以中國內政問題為核心，除前述之勞動問題還包含政經體制改革與少數民族問題。90 年代的中國在國際環境上面臨蘇聯瓦解與冷戰結束，在國內面臨天安門事件之餘波，此時毛里的文章主要著重在檢討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政治以及鄧小平的修正式社會主義路線。並在此時期加入了學際研究、比較研究的視角研究中國。2002 年毛里於早稻田大學開始推動 21 世紀 COE「現代亞洲學的創生」計畫，之後主要發表文章即圍繞在日中關係、東亞共同體之構築與現代亞洲學。觀察毛里的研究與著作，可發現其中研究主題相當廣泛，從中國政治體制、民族政策、中蘇關係、日中關係到亞洲學研究都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大體而言從這些研究議題的轉變可發現，其研究問題之動機與選題，受機構與時事影響為多。

第三節 由對象化中國到自者研究的轉變

毛里大學時代雖為歷史學出身，但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國問研訓練的影響較深，也就是以現實資料為主。她認為中國研究應將中國對象化並還原為社會科學，中國式的體制也應該對象化為政治學的一部份。並認為現代史的問題只能用社會科學的方式解明，而歷史學無法解決。由於國問研所屬於外務省的機構背景，其研究員算是廣義之公務員，因此毛里選擇就職研究所時被要求不得涉入政治。

在此可觀察到毛里所在研究機構的屬性若干反映到她的研究方法與取向。在

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主要的學會、研究機構有 1946 年成立的中國研究所、1951 年成立的日本現代中國學會、1953 年成立的亞細亞政經協會、1958 年成立的亞經研與 1960 年成立的國問研。其中由通產省設立的亞經研以及外務省所轄國問研，兩者都是日本政府成立之「政策智庫型」研究機關，特色是官方作為主導機關以及美式的區域研究途徑對其成立產生了影響。(邵軒磊，2009:95)此外，亞細亞政經學會主要以區域比較研究為研究途徑，並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學會成立之初受日本政府的經費補助，且許多外務官僚也參與學會活動。(郭永興，2004:65)

相較之下，中國研究所與日本現代中國學會則有濃厚的左派傾向，兩機構的成員重疊性很高，也都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良好的關係。(郭永興，2004:65)如在 1951 年，日本維持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同時，日本現代中國學會將「中國」一詞定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會通過決議，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接觸，此決議反映了該學會鮮明的政治立場。(Tomoyuki Kojima,2007:133)

日本的中國研究中這種政治取向反映在文革時期學術社群間的激烈對立。當時的中國研究學者區分成左派與非左派。左派學者多為中國研究所與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的成員，他們讚美文革，且將中國官方提供的資料，直接發表在中國研究所的期刊。這些左派學者反對和美國學者合作，也抗拒美國提供的研究經費與美式區域研究方法。而非左派學者，則在亞細亞政經學會或亞經研的期刊上發表研究。在 60 年代的政治風暴中，亞經研甚至不招募所外的中國專家，以免將政治風暴帶入所內。(郭永興，2004:66) 毛里表示文革期間相對於其他研究所內部發生激烈鬥爭，國問研則比較平靜，秩序良好。此外，與大學時期參與安保鬥爭時相比，毛里在進入國問研工作後，也跟 1968、69 年在日本各大學開始的以意識形態為主的鬥爭浪潮，特別是「全學共鬥會議」推行的學生運動拉開距離。(石之瑜等編，2011:299)

國問研的官方機構屬性加上毛里本身由於世代因素，與中國沒有所謂的「關

係」，使毛里的中國研究得以與中國保持了一定距離，是一種日本國內不同年代的全新中國觀，而體現此種中國觀的作品為 1993 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政治》，此書代表著日本新中國觀的展現與現代中國學的確立。對毛里而言，從她這個時代開始是與中國沒有因緣的世代²³，並開始與傳統日本東洋學斷絕。透過將中國對象化，日本已可從自身認同中，將中國解放出來。

這種從世界及國際政治的視角，將中國及中國外交相對化，回歸至社會科學之研究觀，毛里指出這些認識特別受到林德貝克著作的影響。林德貝克 (John M. H. Lindbeck) 編輯的《中國：革命社會的管理》(*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帶給她很大的震撼，尤其感受到它與日本的中國研究不同。讀這些論文時得知²⁴，僅對中國發生的事情進行「說明」不是中國研究，必須進行「分析」，此時就需要分析工具。而毛里實施此研究方法的第一個應用例為衛藤瀋吉主持的「現代中國的結構分析」計畫²⁵。此計畫應用「功能主義分析方法」來研究，使得中國由原來的某種浪漫或憧憬的對象，轉變成分析對象²⁶。此計畫先後邀請了政治、外交、經濟領域的研究者加入，包括岡部達味、德田敦與中島嶺雄等知名中國研究學者。

2001 年發生的 911 事件以及之後美國的回應方式，是造成毛里創立現代亞洲學的契機之一。由於過去日本區域研究，多以美國對非西歐世界的戰略利益為研究出發點，完全缺乏對他者的理解或與他者共存的認識，幾乎是以推廣自身的國家戰略以及美國文明觀為目的。以致目前所使用的傳統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生態學理論，事實上為「歐洲學」，從而產生了學科中視東方為異類，有待改造的所謂「東方主義」化的疑惑。因此，與歐美視點相對化便成為現代亞洲學的主要課題，主張「透過累積亞洲內部的觀察，開發出『不斷生成亞洲』

²³ 此指對中國幾乎沒有抱持侵略或根深的日中文化(如同文同種)的心態。

²⁴ 如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賽爾登(Mark Selden)、白魯恂(Lucian W. Pye)等知名中國研究者。

²⁵ 計畫成果於 1982 年由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出版—《現代中国政治の構造》。

²⁶ 2012 年 7 月 27 日在臺灣大學的「中國研究的口述知識史工作坊—東南亞與日本」演講

的內部方法論。(堀內賢志，2007：90-91)。這也就是進行非他者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毛里嘗試以自者研究的立場，開發出從亞洲中探索亞洲的途徑 (approach)。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的目的在討論毛里的生平背景與學思歷程對她中國研究產生的影響。首先，由上述整理可得知，毛里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的契機為被中國的特殊性與神秘性吸引，本身跟中國並無特殊因緣，而得以與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另一方面，毛里的中國研究與她的學思歷程有很大的關係，無論是研究課題或研究方法都深受國問研時期的經歷影響。這些因素的交織，使毛里的中國研究得以對象化中國，並無過去日本中國研究具有的內省性特質，或稱為反省意識。(Ash Robert,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2007:132)

晚近毛里開始對區域研究方法進行方法論上的反省，此時她的研究特色為，強調學科整合，綜合各種社會科學理論進行研究，而不試圖找出「全體理論」；以及以東亞模式貫穿研究主題，強調要建立亞洲視點，而非完全接受歐美視點。毛里所開展的中國研究為日本學界開啟了新的研究視角，並進而擴展到亞洲研究，在當今日本學界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毛里的中國研究往亞洲學拓展的過程以及她對方法論的反省，將在後三章進行討論。

第三章、從周邊看中國

中國的民族問題



中國民族問題作為毛里長期以來關注的對象，本章將整理毛里橫跨近25年的民族相關研究並與過去美日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相互對照。目標是透過檢視毛里的研究途徑與她的民族觀，總結毛里的特殊論點，並探討民族研究在毛里學術生涯的重要性及對她之後研究所造成的影響。

第一節 日本學界的民族研究發展

日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與日本國內政經形勢的變化與日中關係的狀態有密切相關。

戰前日本對中國的調查和研究，與日本政府推行的殖民主義與東洋史學息息相關，特別是經過日清、日俄戰爭後日本的勢力範圍漸漸從朝鮮向中國東三省、蒙古滲透，與此相應，日本學界的研究範圍也從朝鮮隨之向中國東北、蒙古擴大。東洋史學創立者白鳥庫吉在 1908 年向滿鐵總裁後藤新平建議成立「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奠定了日本在中國現地調查與研究的基礎，而 1911 年起發行的《東洋學報》是日本學界「調查報告」傳統的源頭。此時的東洋學研究也建立了實證調查系譜，具體成果有滿鐵東京支社中的學術調查部對於滿州與朝鮮作的歷史地理調查和「滿洲舊慣調查 1914-15」，及 1939-44 年由滿鐵調查部、東亞研究所、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共同執行的「中國慣行調查」等。(邵軒磊，2012:19) 此時東洋學的目標是研究東洋(特別是中國)全部的社會文化現象與綜合文化研究，不只對於古代或近代，甚至表面的現象與時事解說都可以納入。以滿鐵、東亞研究所為核心的研究機構，是當時的東洋史學者主要就職之處。(邵軒磊，2012:19)而日本在戰前，即透過這些機構對中國東三省的諸民族實施了調查與研究，其主要目的是為殖民政務服務。

戰後日本對中國民族的調查與研究，受當時條件的限制，兩國交流斷絕，無法至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多依賴文獻進行研究。此時期日本學者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有以下特點，(1) 研究重心由東北轉移至華南(金少萍，1999:69)；(2)日本民族學透過恢復重建調整階段，由為殖民主義服務中解放，擺脫以落後民族為對象的研究；(3)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為主，具體表現為對戰前和戰時的大量資料與論著進行分類整理；(4) 研究內容以歷史學、語言學和文學類研究為主。(崔蓮，2003:37)

總而言之，這個時期日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總體來說研究基本上是分散進行，研究範圍較狹窄。1980年以前，在日本論述中國少數民族的專著甚少，主要代表作為村松一彌(1973)的《中国の少数民族: その歴史と文化および現況》一書，作者在當時資訊封閉的情況下，盡可能收集到完整資料，對中國 54 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等進行了概述。這是日本第一本對中國少數民族進行全面概述的著作。(崔蓮，2001:53)

這種封閉的情況在1970年代後發生改變，中國結束文革，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加上中日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實現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兩國重啟學術交流。1979年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日本民族學者代表團²⁷在戰後首次正式訪問中國，打開了中日學術交流的開端，此後，日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

進入8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陸續到中國少數民族地區訪問、進行田野調查，寫出了許多描寫和分析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歷史與文化的論著、紀行、論文等，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進一步促進民族研究的深化。這時日本民族學對中國大陸的調查與研究有了空前發展，陸續出版了不少專著和一般書籍。較具代表性的有：白鳥芳原著(1985)的《華南文化史研究》、《述說中國的少數民族——梅棹忠夫對

²⁷由梅卓忠夫擔任訪問團團長，以及白鳥芳郎、岩田慶治、鈴木二郎、米山俊直等 5 位教授組成日本民族學者代表團。

談集》(1987)、加加美光行著(1992)的《知られざる祈り-中国の民族問題》、竹村卓二(1994)編《儀禮、民族、境界——華南諸民族漢化的諸相》、毛里和子著(1998)的《周縁からの中国》等。(金少萍, 1999:70-72; 崔蓮, 200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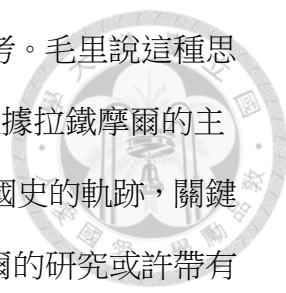
此時民族研究的主題也發生轉變, 1990年代前, 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學者, 多專注於家族關係、冠婚葬祭、社會組織、宗族、神話、民間故事、傳說、習俗、音樂、舞蹈、服飾等民俗學方面。由於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前, 很難進行田野調查式的文化人類學研究, 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只停留在對中國出版的著作進行翻譯或解釋。所以部分日本學者也繼承了中國共產黨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觀點以及為了維護統一國家體制的方法論。直到1990年後以後, 日本學界才開始探究中華民族的本質問題。(松本真澄, 2003:20)而毛里的中國民族研究剛好就在這研究方法與主題產生劇烈轉變的浪潮中開展。

第二節 研究源起

根據毛里本人所述, 中國民族研究是她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²⁸。關於為何對民族問題抱持關心並著手研究的契機, 毛里說明, 過去研究民族問題有多種不同的研究途徑, 如語言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 而她採取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帶有不純的動機。(毛里和子, 2000a)

首先中國研究作為一種職業, 毛里一直在思考如何描繪出平衡的中國像。她指出, 如果只從正面去研究中國, 視角反而會受到限制, 由側面或是斜面去觀察反而可能掌握全體, 由周邊、四隅去觀察「中華世界」, 也許更能獲得靈感。此外, 民族、國境、國家, 這些概念事實上是流動的且相對的, 特別是民族到底是什麼, 這點需要重新思考。最後, 當今的中國政府雖主張自己是現代國民國家, 但在實際上難道不是帝國嗎? 毛里指出, 自身主觀與實際的差異非常之大, 且此異常太過巨大且非常地一元, 對此點感到怪異。

²⁸ 2012年7月27日在臺灣大學的「中國研究的口述知識史工作坊—東南亞與日本」演講



因此，要如何理解中國，可用民族、非漢民族的角度去思考。毛里說這種思考角度不可否認是受到了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影響。根據拉鐵摩爾的主張，中國是在文化上不斷進行擴張的民族與國家，而要了解中國史的軌跡，關鍵之鑰即為釐清中國邊境地區與中心的關係。毛里指出，拉鐵摩爾的研究或許帶有對少數民族抱持個人情感之主觀因素存在，而導致他的研究有所歪曲。但也正因如此，可稱之為「具人道面孔的邊境學」。(毛里和子，2000a)

毛里表示當她進行邊境研究時，不可否認帶有對異質文化的興趣，也就是所謂的「東方主義」的異國趣味。如同在中華思想中，對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邊境研究即帶有審視與自者相異且較落後的他者的意涵存在。毛里表示進行研究時，必須持續注意避免落入東方主義的陷阱，盡可能地去接近當地人民的想法，思考對當地人民何者才是最重要的，細緻地進行邊境研究。(毛里和子，2002:282)因此對毛里而言，民族研究具備作為周邊視角的魅力，同時也帶有異國式的情懷。

在1980年代之前，受限於中國的政策限制，毛里的民族研究主要以官方文獻的探討作為研究基礎，直到80年代後，毛里才有機會至中國進行現地調查研究。關於毛里對少數民族的田野調查經驗，包含1986年在新疆伊犁地區，以及1989年至1991年三年在中越緬地帶進行三次雲南少數民族的現地調查，此次現地調查跟雲南民族學院合作，主題為中國的現代化政策與少數民族的傳統問題。此外，毛里受限於不會藏語或蒙古語等少數民族的語言，研究資料以中文與英文為主。

毛里的民族研究範圍涵蓋甚廣，在歷史縱向上，溯及清朝的邊境政策至中共改革開放後的民族政策，在區域橫向上，內蒙古、新疆、西藏與雲南皆有所涉獵。特別是1998年的《周縁からの中国》可視為毛里研究中國民族問題與政策的集大成學術著作，同時也是毛里的博士論文，是第一本對現代中國的民族與民族問題進行一個體系性考察的著作。關於中國的少數民族研究，過去雖然有不少的文化

人類學研究，但探討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與變化，以及其與少數民族之呼應關係，且在國內關係之外，加入國際關係視角成為體系性之研究，此作為首次嘗試。研究採用的分析方法為區域研究，加之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等分析手法。此題目可觀察到其意欲表明其視角的方向性，毛里以中央權力的統合政策與其變化，以及與民族·文化少數者對抗之間的相互作用切入分析。其最終目標為透過此相互作用的場域，從「周邊」出發反過來影響「中心」，開創分析中國政治的新視角。另一方面，毛里也自承由於採用國際政治學視角，而受到部分民族學者「為何關於民族·邊境地區的研究，全都是在寫紛爭的歷史」的批評。對此類批評，毛里認為相較於以民族誌研究為主的人類學，政治學是關於紛爭處理的學問，唯有將研究民族的共生與文化滲透的軟學問與研究民族紛爭的硬學問兩者結合，才能把握全體像。

第三節 毛里和子的民族問題研究

壹、研究視角—周邊觀點

拉鐵摩爾這名字不斷出現在毛里的中國研究中，因此首先須探究對毛里而言拉鐵摩爾的魅力為何？拉鐵摩爾的研究給毛里的中國研究帶給了怎麼樣的啟示與影響？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是美國研究中國邊疆問題的著名學者。1901年拉鐵摩爾隨父親至中國，1922年他獲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獎金，曾至中國新疆、內蒙古和東北及中亞地區等地考察，著有《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亞洲問題的解決(Solution in Asia)》、《亞洲的樞紐：新疆及中俄亞洲腹地的邊疆(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等諸多著作。1933年起，他擔任著名的《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的主任編輯。1938年起他執教於霍普金斯大學，1941年由

羅斯福推薦任蔣介石的私人政治顧問。當冷戰開始後，他成為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對象，致使拉鐵摩爾在 1963 年不得不離開美國，移居英國在里茲大學繼續他的中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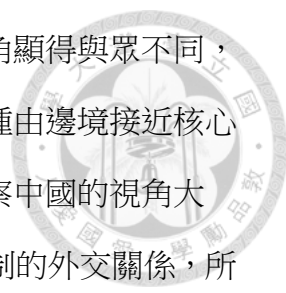


重視牧業社會的影響，將其納入中國史研究的整體範疇，是拉鐵摩爾中國邊疆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黃達遠指出，將拉鐵摩爾的著作與傳統著重於農業社會的中國史研究相比較，可以看出兩個重大區別，一是重新定位影響中國歷史的地理空間，將觀察中國的視野擴展到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和綠洲，闡述游牧民族與漢地居民之間密不可分的歷史聯繫。二是拉鐵摩爾依據「華夷平等」的觀念，將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置於同等的歷史話語中進行考察。(黃達遠，2011:34)

拉鐵摩爾關於中國邊疆問題探討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認識到中國的統一性來自農業社會與游牧社會的互補共生關係。他將視野放大到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之間的過渡地帶以及這一地帶如何成為中國歷史變革的動力源頭上。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將這些過渡地帶稱為「邊疆貯水池」(Reservoir)，指出過渡地帶是農業文化和牧業(半牧業)文化互動的結果，亦即「中國」的形成是一個互動過程。

他發現對漢族而言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來說卻是一個中心。(黃達遠，2011:36)而正是這些過渡地帶形成了「邊疆—民族」關係體的地域構成，它既是農耕帝國從中心向外拓展的歷史結果，也是草原帝國對農耕文明持續性壓力的地理表現。(張友庭，2010：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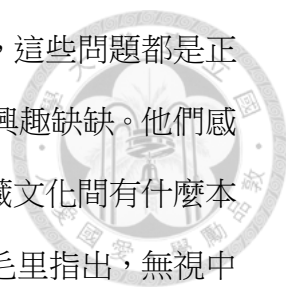
拉鐵摩爾在另一著作《中國簡明史(China, a short history)》中，在縱向時間軸描述了地主—官僚—仕紳與農民間的對抗關係，在空間上則描繪了中國文化的成長與中華民族擴張的動態過程。拉鐵摩爾指出，中國民族與其文化，有越過中國國境往外部擴張的傾向，而要通曉中國歷史的重要關鍵即為掌握中國與它周邊「夷狄」地區之間的勢力消長的狀況。



相較於同時代的漢學家，拉鐵摩爾採取的「夷夏互動」視角顯得與眾不同，擺脫過往「華夷中心觀」思惟更是中國史研究的一大突破。這種由邊境接近核心的研究視角與另一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觀察中國的視角大相逕庭。費正清主張，中國對外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制的外交關係，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國家可以分為三個大圈：第一個是漢字圈，由幾個最鄰近而文化相同的屬國組成，如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日本也短期屬於這個漢字圈。第二個是中亞圈，由內陸亞洲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屬國和從屬部落構成，它們不僅在民族和文化方面相異於中國，而且處於中國的文化區以外或邊緣。第三個是外圈，一般由「外夷」組成，如東南亞、日本以及歐洲等。相對於費正清主張中亞圈與中國處於一種競爭狀態，拉鐵摩爾則特別強調遊牧社會與農業社會間的互補共生的歷史關係。(黃達遠，2011:38)

毛里在各種研究著作中，經常提及拉鐵摩爾，她直言非常喜歡拉鐵摩爾，特別是拉鐵摩爾那不循規蹈矩的性格。毛里也比較過拉鐵摩爾與費正清的學術生涯，指出費正清是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正統派學者；相對的，拉鐵摩爾則未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而是透過1920年代時行走於中國、蒙古與突厥斯坦區域的貿易經驗，以親身經歷作為研究歷史學與區域學的基礎。(毛里和子，2002:269)此外，相對於正統派的費正清以權力、儒學與官僚制研究中國，拉鐵摩爾採取由邊境接近核心的研究視角，以時間上地主/農民間的對抗關係與空間上文化勢力圈為基礎，試圖掌握政治·文化的中華思想對外擴張的動態過程。(毛里和子，2002b，195)在此拉鐵摩爾帶有反學術權威的形象，特別是規避現代主義的態度與反教條主義，重視現實的思考方式，對毛里而言是非常有魅力的。

但毛里說明，她強調周邊視角的重要性並不意味著無視中心的角色，指出雖然拉鐵摩爾在早期作品中，有過於放大邊境因素在中國史作用的傾向，但他透過納入階級抗爭關係等分析要素，有意識地在邊境與中心取得平衡。(毛里和子，1979:98)但現今較年輕的邊境研究者則出現了「甜甜圈現象」。舉例而言，當今



中共的一黨體制下的政治制度之內涵為何，會如何走向民主化，這些問題都是正統中國研究中應當關心的議題，但是新一輩的研究者們對此卻興趣缺缺。他們感興趣的是像西藏為何會強力反抗北京政府，或是北京文化與西藏文化間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其他台灣與蒙古的相關研究也有類似情況存在。毛里指出，無視中心而只專注在周邊的結果就會變得像甜甜圈一樣，她理想的邊境研究是站在周邊的立場注視中心。(毛里和子，2002:272)由此可看出毛里的邊境研究帶有強烈的目的性，雖強調周邊觀點，但最終關心的仍是中心的內實。

貳、中共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創造機制

毛里在1998年的《周縁からの中国》一書中，首先回顧清朝後期與中華民國時期的民族政策，毛里指出此時中國中央政府的邊境、民族政策特徵為，由帝國「寬鬆的支配」轉向至均質的國民統合；與導入省制，進行邊境的內地化。在分析清廷與中華民國政府對新疆、內外蒙古與西藏之政策後，毛里提出下列結論。清廷的邊境政策雖為文化的一元主義，但由於帝國的寬容性與其統治能力的制約，實際上具有相當的開放性與多元性。至民國時期，以日中戰爭為契機，「中華民族論」等民族主義高揚，成為一元化現代國民國家的傾向增強，以內蒙古的內地化政策為首，開始加強對邊境的統治。但國民政府雖有邊境政策，但缺乏民族・宗教政策。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繼承國民政府尚未完成的現代國民國家化之課題。

中國共產黨至1930年代，仍承認民族自決權與分離權以及構想採行聯邦制，但受中日戰爭的影響，轉向統合國家的構想，採用區域自治制度。相對於國民政府，中共採取將邊境的居民視為民族・宗教的少數者此新方式，並賦予他們民族地位，並透過此方式使他們有了成為國民的認知。由此理解角度出發，毛里歸納出中共的民族政策的三個基本目標：統合國家領域、邊境的對外安全保障、形塑擁有忠誠心的均質人民；與三個基本政策：民族間政治與經濟的平等、地區自治

政策、與民族・宗教領袖的統一戰線戰略。根據毛里的觀察，數十年來中共對民族問題的基本目標大致上無太大變化；在政策層次方面，除了在文革時期，民族問題全被視為階級問題，並進行毛主義所主張的「諸民族的融合」措施，實際上就是漢族往少數民族地區大量移民的「漢化」政策，造成民族工作停頓之外，其他時期的政策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在政策執行上有穩步與急進的區別。(毛里和子，2001a:18)

由上述中共的民族政策的目標與內容可得知，中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雖名為保護少數民族的利益，但實際上民族利益是被規範在統一國家、社會主義路線與黨的指導此強力框架中。特別是 1959 至 1962 年的中印紛爭與 60 年代後的中蘇對立，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與國家安全議題相連結，使得民族政策完全服膺於國家目標。(毛里和子，1987:466,485)

毛里指出中共民族政策最大的特徵為民族識別工作(辨明民族之來源與民族之名稱)，此種「民族創造之機制」，顯示出中國的民族並非是客觀先驗之存在，而是歷史・流動的，可塑且被創造的存在。而在探討中共民族識別政策內涵之前，須先檢視中共的民族理論與民族判別的標準，以回答是誰掌握了民族定義權、以及區分各個民族的目的為何等問題。

根據毛里的觀察，社會主義中國對民族的定義，數十年來表面上雖以史達林的定義²⁹為基礎，但實際上中國的「民族」與史達林的定義相去甚遠。中國對該定義的詮釋如下，(1)地域雖然是民族形成的基礎，但即使是散居在不同區域，也並不意味著共同體的分裂；(2)語言是民族識別的一個主要根據，沒有共同的語言就不能被稱為民族共同體；(3)經濟生活雖然是民族的特徵之一，但過去經濟中心有可能多民族互相共通；(4)文化心理要素是民族識別工作中最重要的基

²⁹史達林對民族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史達林，1953:294)

準。因此史達林對民族定義的四個要素在中國的應用上都顯得曖昧不清，如回族，由於長期的雜居與同化，在人種上與漢族相近外，也沒有獨自的居住地區、經濟生活與語言，但仍被認定是少數民族。(毛里和子，1996:34)



毛里整理出中國民族概念的三個特徵，首先，在史達林的民族定義的四個要件中，中共非常重視共同語言與共通的民族心理(民族特性)，視為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重視共通的民族意識(民族感情)要素，體現在民族識別工作上，強調先有民族的自發性要求，再由政府進行識別工作。第二，相對於史達林的資本主義民族論，中國的民族定義範圍更廣泛，涵蓋了原始部族、部落等。最後是重視漢民族形成時對國家統一起的作用。

由上可看出中國民族理論的務實性格，相較於史達林的定義，較貼近於 Otto Bauer 的主張。根據 Otto Bauer 的定義，民族是由共同的命運而結合，並擁有共同的民族性格的人們組成的。毛里指出雖然中共批判 Otto Bauer 的主張是非科學的、唯心主義的，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史達林的定義是根據歐洲民族發展史導出的結論，不見得完全適用於中國，最後提出的民族理論較貼近 Otto Bauer。Otto Bauer 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全體成員將再度統合成為文化共同體的統一民族」，社會主義自身「為特有的民族史的產物，具備特有的民族個性」。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自 1940 年代以降，高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60 年代與蘇聯進行意識形態的對抗，至今追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可看到與 Otto Bauer 的主張有若干相合之處。(毛里和子，1987:481-484)

對於民族識別政策的評價，毛里指出在過去歷史，中國中央的權力無法觸及到邊境區域，因此蒙古族、藏族或是被隔絕的原始部族等，都對中央權力沒有一體感，缺乏連帶的歸屬意識(われわれ意識)。所以新政權必須塑造他們的認同，培養忠誠心，形成「人民」或是「國民」意識。透過民族的發掘、民族識別工作、民族語言的創設等措施將這些「異端」轉化為國家的「國民」，這種從上到下的

國民形成過程政策，對歸屬意識的形成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毛里和子，2001a:17-18)

另一方面，對於在民族識別政策下，如維吾爾族或藏族等人口總計五百萬以上的民族，與基諾族此人口2萬餘的民族，被賦予同等的少數民族權利與地位，毛里指出此點極不合理。以藏族為例，毛里指出藏族文化具有與漢文化完全不同的特質，並以此為基礎，構築了文化的、政治的與宗教的共同體。但在基諾族的情況，毛里認為他們是被政府發掘、辨別、承認而成的族群(民族)。毛里指出，這或許帶有政治的考量，中國政府有意識地將藏族的文化與政治認同拉下至與基諾族同地位上。(毛里和子，2002:280)

中共做為新政權，為了要與將非漢民族視作「宗族」，並壓抑之的舊國民政府做出區別，提倡諸民族平等政策，賦予小型的族群「民族」的地位。但反過來說，原本的民族也被「降格」到跟族群相同的地位。這種民族識別政策造成的影響，除了透過給予過去被稱為部族或部落的族群「民族」地位，強化其民族意識。另外就是蒙古族、藏族等大族與升格為民族的基諾族站在同一立足點上，也就是根據對漢民族的關係(以漢族為中心)，將這些族群一概而論為「少數民族」。(毛里和子，2001a:18) 因此民族識別政策雖在創造邊境民族與少數文化者的國家歸屬意識與信賴感有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此種同一化的民族政策，也有意識地消去了這些屬於異質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之民族的歷史。毛里對此政策的評價，可看出其與民族學者不同的視角，相對於民族學者強調民族間的原生差異，毛里以政治學角度切入，強調民族·族群意識的被塑造及少數民族間權利地位的實質不平等。

參、「中華民族論」考與國民意識的形成

上述檢討毛里的研究視角與民族觀後，於此將整理當今中國面臨的民族問題和認同危機，以及毛里提出的解決之道。

毛里在「中国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クライシス」(1995)與「中華世界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と再鑄造」(2001)二篇論文中，對中國發生的認同危機進行詳細的探討。毛里指出，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面臨了意識形態浪潮的後退；經濟分權化導致的中央政府權力下降；香港以「特別行政區」的姿態回歸，改變了中央地方一元體制；伴隨著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弱化，非漢民族地區頻繁發生宗教或民族的抗議活動等課題。

因此自 80 年代以來，中華世界³⁰的凝聚性，相對於毛澤東時代，明顯的呈現多元性、分散性與離心狀態。中國過去的向心力是依靠設定對外假想敵的「應激反應型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這些官方意識形態、對世界揭示新的價值觀的道德使命。這些因子透過毛澤東的個人魅力、能力以及政治和思想上的動員，形成了中國的認同。

但在改革開放，冷戰結束後，「應激反應型民族主義」隨之褪色，此時中國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文化上的向心力都急遽地衰退。過去中國認同的核心是透過外部敵人而凝聚起的民族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但隨著向心力的失去，中國面臨了認同危機。此時在中國，「中華民族論」、民族凝聚力與愛國主義等被視為解決認同問題的良方，成為熱門議題。毛里對這些途徑對解決問題的有效性與否進行論證。

首先關於中華民族論，毛里指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³¹論點，並非是民族學上的討論，而是涉及現在中國的「國民」形成，

³⁰毛里對中華世界的定義：中央政府自身認知到的領域範圍，包含已經支配的領土，以及「尚待收復」的領土。具體而言，包含中央的一般省地區、周邊的自治區、1997 年回歸的香港與澳門，以及「尚待收復」的台灣。(毛里和子，2001:34)

³¹費孝通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書中指出，在過去的三千年中，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並逐漸將周圍的異族吸納進這個核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並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路，奠定了以這個

帶有強烈的政治意涵。費孝通的「中華民族」論雖受到混淆了國家與民族概念等批評，但在政治領域上變成「常識」般的存在，透過強調諸民族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有機構成要素，批判西藏與新疆的分離主義，以及台灣獨立的主張。

毛里指出費孝通的論點若干繼承了梁啟超、孫文與蔣介石的主張，而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論其特殊之處為，將非漢民族也視為「民族」而非宗族或族群，並以漢族作為核心，將居住在中國地區的各民族統稱為中華民族。換言之，費孝通將少數民族提高至民族地位，然後在民族層次之上，再創立一個階層稱之為中華民族(the Chinese Nation)，如圖 1 所示。在費孝通的論述中，中華民族並非是各種族群(ethnic group)的總稱，而是一個民族(nation)。

從這觀點看來，在費孝通的語境裡中華民族的概念幾近於國民國家中「國民」的概念。對此，毛里提出疑問，為何中國執著強調經由長久歷史而形成的「民族」，而不直接稱之為「國民」？(毛里和子，1995:11)除了這種民族與國民定義上的紊亂，加上在中國，多使用人民或大眾，而少見國民之語彙。以「人民」代替「國民」的概念是中國特有的情況³²。對此，毛里認為，現代中國擁有作為政治認同的人民，以及作為文化、歷史認同的中華民族，這兩個國民(national)的集合概念。(毛里和子，2001a:31)

但中國的國民的形成，由於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問題，在政治認同的塑造上有所缺憾。毛澤東時代以革命與獨立的達成作為統治正當性的基礎，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經濟的崩壞與毛澤東的死去後，此正當性被磨滅。取而代之，鄧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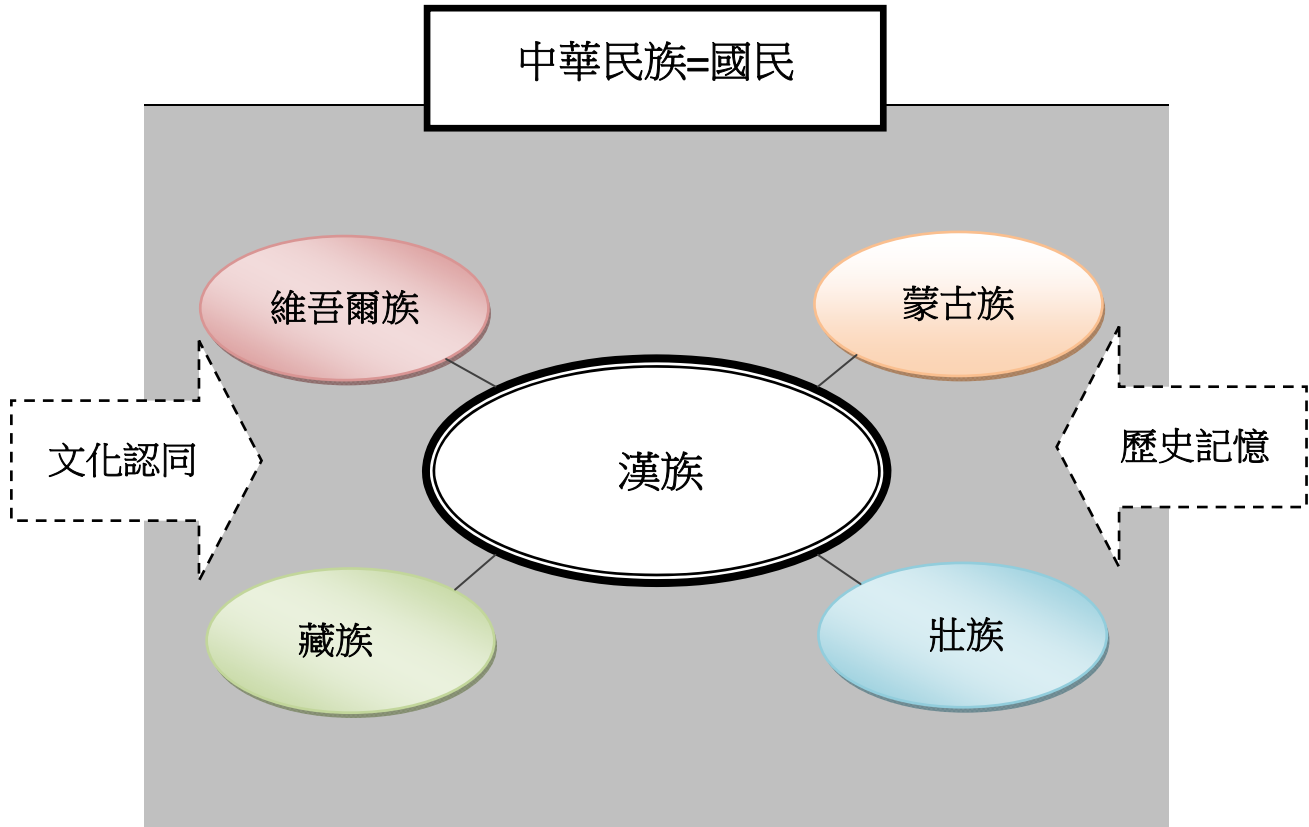
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再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費孝通，2003:4)

³²其中差別，根據周恩來在 1949 年 9 月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的發言，是基於在社會主義的階級立場之差異。國民為尚未經由社會主義改造之人，包含「人民之敵」，因此雖無擁有人民的權利，但仍要恪守國民的義務。在此，國民的概念為擁有中國國籍之人，等同於公民。(毛里和子，2001:31)

在 1980 年提出經濟現代化與祖國的統一(香港與台灣的回歸)作為目標，意欲重新樹立共產黨支配的正當性。在改革開放 20 年中，中共成功實現了經濟大國與香港和澳門回歸的目標，但當前體制的正當性能維持到何時，毛里對此抱持疑問。



圖 1 中華民族論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論透過強調共有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以提高居住在同一領域國家內居民間的凝聚力的同時，忽略了其他擁有不同文化與歷史記憶的族群，對「連帶歸屬意識」的塑造也有所不足。因此毛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實際上還未成為國民國家，無論是國民或國民國家都是尚在發展成型階段。(毛里和子, 1995:17)依據國民與國家的形成過程，毛里將國民國家分為四種類型，如表 1。(毛里和子, 2001a:32)

表 1 國民國家類型



國民國家類型	國家與國民形成	實例
西歐型國家	同步進行	西歐國家
前殖民地獨立型國家	先決定國家領土範圍， 再形成國民	亞非拉前殖民帝國國家
近代帝國轉型國家	大致上繼承帝國時期的領土，在新體制下建立現代國家，形成均質的國民	中國、俄羅斯(前蘇聯)
移民型國家		美國、加拿大、澳洲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毛里和子，2001a:32)

如表 1 所示，中國具備前帝國的屬性，但也擁有抵抗帝國主義而建立現代國家的歷史經驗，因此同時具備第二與三種類型的特性。而中國的族群問題，由於前殖民地與帝國的雙重身分混雜交織，導致問題內容與層次更加複雜。舉例而言，對中國而言，1895 年成為日本殖民地，現今尚未收復的台灣，被認知為「遺失的存在」，由這點來看，現在中國是尚未完成的國民國家，尚在形成過程中。但另一方面，現代中國的內部同時存在「殖民地」的結構。在 1958 年後，對新疆與西藏地區的居民而言，無論是經濟與政治的統合，或國家的開發都是對少數民族進行殖民地式的榨取。(毛里和子，2001a:33)

中國與蘇聯過去都擁有長久的帝國歷史，脫離帝國立即轉入社會主義階段的兩國，是否有成功形成國民與國民國家？對此問題，毛里認為蘇聯在 1960 年代

推動的「蘇維埃人」與中國的「中華民族」概念非常相似。繼承「帝國」時期的政治空間與文化，尋求獨立、經濟發展的中國近代 40 年歷史，亦可視之為國民與國民國家形成的過程。但是一元的政治體制與毛澤東思想的影響，看似成功塑造了國民國家，但實際上缺乏內在凝聚力(國民意識與經濟的有機一體性)，結果變成「類國民國家」。(毛里和子，1995:21)

除中華民族論之外，自 1990 年來中國高舉愛國主義，強調要強化「民族凝聚力」。中國在近現代開始以來都是透過外來的威脅來強化民族凝聚力，或稱之為「救亡圖存」，但自 80 年代以來，失去外敵的中國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除此之外，作為凝聚力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由於黨的腐敗導致其凝聚性顯著流失，加上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崩解，帶給中共領導人強烈的危機感，從而認知到「民族的凝聚力是總合國力的重要要素」。但在現在與外界接觸頻繁、推行市場化經濟的階段，要強化凝聚力，僅賴「發揚民族文化」、「回歸傳統」是不足的，中國也開始出現須強化「社會凝聚力」的認知。毛里指出，這種從「文化凝聚力」至「社會凝聚力」的轉變是創造作為有機統一體的國家、作為國家主體的「國民」的契機。(毛里和子，1995:13-15)

面對根據國內外情勢與國家目標的變化，統治原理也會隨之轉變。過去的傳統中國，是透過文化原理(漢字與禮)寬鬆地統治帝國。之後面臨「西洋的衝擊」，推翻清王朝的中國民國，以孫文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則運用種族民族主義為武器，意欲創立現代國民國家，實行軍政、訓政、憲政，此時統治原理的內涵為政治上的一元主義、共和制與民主制。在民國時代，由於日本的侵略與政府自身的腐敗，創立均質的現代國家之目標並未達成。至 1949 年，人民革命後樹立之新政權，透過「應激反應型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承繼民國時期的國家目標，持續往創造現代的統一國家與均質的人民的方向邁進。此時中共透過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複合統治原理欲創造純粹理念型國民國家。而在改革開放後，面臨理念危機時，鄧小平揭櫫新的統合原理—「愛國與富國」以及中華民族。但即使透過

經濟成長實現了大國化與富國化，欲透過「愛國」以及中華民族此曖昧的文化認同，進行統合的嘗試並未成功。毛里指出在尚未形成「歸屬連帶意識(われわれ意識)」與「屬於自身之物(われわれもの)」之前，鼓吹愛國主義與中華民族論的效果皆是相當有限。(毛里和子，2001a:36-37)

如上所述，毛里認為，要對現在國家與政府懷有認同感，不論是訴諸於愛國主義或是中華民族論都有所不足。中華民族論僅限於文化認同面向，對於沒有共通性部分的處理也缺乏魅力。而作為民族凝聚力核心的愛國主義在中共統治逐漸流失正當性之情況下，也缺乏說服力。毛里指出，解決中國民族凝聚力與認同問題的根本之道為形成政治認同，換言之，必須形塑國民意識，從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的認同，邁向政治的「連帶歸屬意識」。(毛里和子，2001a:34)而形成國民意識的關鍵並非是弘揚愛國主義或中華民族意識，而是對國家與政府產生「參與意識」，當對國家與政府產生連帶感後，新的認同隨之生成。而除了國民意識的形塑之外，毛里提出將紛爭制度化的必要性。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中國需要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對於統合的形式也要有彈性的思考，從過去一元的、均質的國民國家此種理念束縛中解放。(毛里和子，2001a:46)

而關於問題解決的具體實踐方式，毛里在此引述了徐賁的論述。徐賁指出，「初級性認同」³³易被來自外部的力量或「汙染」而被威脅與破壞。而強調「初級性認同」的民族主義常常被用來掩蓋共同體內部的歧異、矛盾和衝突，如中共時常將在新疆等地發生的「分裂主義」視為外來威脅。另一方面，公民型、能動型的認同則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威脅與汙染。徐賁指出，當前中國緊要的課題並非

³³美國著名人類文化學家格爾茨(C Geertz)曾指出，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集體身份認同往往包含兩種不同的因素：「初級性認同」和「公民性認同」，前者只是喚起我們樸素的「原始情感」，而只有後者才為我們介入「公民政治」提供有效身份。「初級認同」其被動性使人的自我意識束縛在血緣、種族、語言、地域、宗教或傳統等實在因素中，意味著對群體的依附和聯繫是由外界因素決定的。而「公民認同」對群體的依附和聯繫則包含了一種積極的參與意識。(徐賁，1996：69-73)

是去說明「初級性認同」的存在，而是去創造出對共同體含有的積極性之共同認識。而塑造這種能動性認同的核心為，公民的政治參與以及具備民主與人權的「憲法愛國主義」。毛里指出，徐賁的「以文化角度說明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反而落入了初級性認同的陷阱」論述，間接了批判費孝通的「中華民族論」中的初級性認同。(毛里和子，2001a:39-40)

毛里強調多元文化與公民參與對緩和民族問題的成效，特別是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成功實現分權化、多樣化後使得走向政治系統的多元化成為可能。以香港的「統合」為例，改變了過去一元化、單層的社會主義中國，代表了一元統治的改變，包容進異質的社會制度。中國「現代化」的成果，形成了多元的、複層的新型的國民統合樣態。(毛里和子，1987:486)以此為基礎，毛里提出以下構想：結合文化的多元主義與政治的複數主義，以創造出擁有複層結構的領域統合之機制³⁴。以及創造邊境住民的政治認同，其方式為住民的政治參與、具備調整利益的機制的多元政治體制。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處理了毛里早期的研究主題—中國少數民族研究，包括問題意識、研究視角與研究內容。相對於其他學者專注於中共時期開始的民族政策，毛里將歷史縱向性拉長，納入清朝及國民政府時期的政策，特別是重視國共內戰時期，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對國民黨與共產黨態度的差異，及對之後中共政策的影響。

毛里指出傳統中國實際上是對異文化寬容的政治共同體，市場分散，無近代的疆域概念，只要能接受文化形式上的融合，邊境便納入帝國成員裡。而現代中國執著地追求疆域與主權概念、集權政體、均質的國民與國民文化、統一市場的理念型國民國家，而被此「國民國家」概念所束縛。其中「毛澤東思想」與「中華民族論」皆為此種嘗試。但毛里認為，「邊境是被創造的」，對邊境住民而言，

³⁴ 主要有五種型式，區域自治、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聯邦制、邦聯制與新宗屬關係。

可以同時擁有兩種不同內涵的「政治忠誠心」，除了對支配者，邊境住民有歷史形塑的連帶歸屬意識，另一方面，在機能上又有對共同體的(joint community)意識。(毛里和子，2002b:196)



由此可看出毛里對邊境形成、民族創造與民族認同的論述，偏重建構論³⁵的主張，指出國民或是族群並非是先驗上的存在，而是被塑造的，可能是自然塑造或是人為塑造。而對國民而言，認同可以有很多層次，而非單層，同時此認同也是可被形塑的。民族、族群與國民間的界線非常的模糊，也是可變的。因此也蘊含了族群國民化的可能性。

雖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但毛里的最終關心仍是現代中國政治體制，所以毛里的少數民族研究並不以微觀方式分析邊境住民的政治與文化的行為，而是以「周邊往中心」照射，透過檢視中國的民族問題與政策照射出中央政府的政治內實。此政治內實即為「一元政治體制與強力的集權系統」，造成民族問題過度政治化，是中央與邊境民族衝突之根源。

此從「周邊」出發的研究視角受美國的中國邊疆問題研究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與毛里本身學術位置所影響。當時拉鐵摩爾的邊疆研究在美國為非主流，《中國簡明史》一書中，指出通曉中國歷史的關鍵之一是瞭解中國和它周圍「夷狄」地區之間勢力消長的狀況，這種「夷夏互動」的視角改變了過去「華夏中心觀」為主的單一結構。拉鐵摩爾提出的「中央權力與邊疆」的互動關係與將「邊疆」置於中國史研究的核心觀念吸引了當時同樣處於學術支流的毛里。

在當時日本社會中，毛里不但須面對女性的身分帶給她的挑戰，加之毛里是歷史學出身，也不屬於傳統中國學的主流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體系。在研究機構方面，當時毛里也不任職於日本主流中國研究機構—中國研究所和亞細亞政經學

³⁵關於認同如何形成的理論，根據施正鋒的區分，在政治學上大致上可分為三種途徑，分別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施正鋒，1998：10-11)

會，而是在官方色彩較濃厚的國問研就職，毛里也指出因為此因素，當時她是屬於與學會無緣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未受過正規大學教育、在美國學界非居主流位置，甚至曾受過政治迫害，帶有非正統性色彩的拉鐵摩爾，特別吸引毛里的目光，亦可說是憧憬般的存在。毛里居於這種非主流學界的位置，也反映在她的少數民族研究之上，以「周邊」的研究視角出發，試圖映照出「中央」的本質。

關於毛里的中國民族研究之評價，在此以日本中國學者村田雄二郎對《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一書的書評概論之。村田指出，毛里的民族研究與個別民族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毛里整理出中國國內外政治情勢與民族紛爭之間的動態關係，並補足人類學研究途徑不足之處。村田如此評價毛里的民族研究，「特別是掌握民族問題被政治化的動態過程時，觀察者需要冷靜纖細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村田也指出毛里的周邊視角帶有目的性，毛里意欲透過政治參與塑造「連帶歸屬意識」，透過政治的複數主義或民主化，使國民統合成為可能。對此，村田認為這不就等同於「周邊刺激中心，將之活性化後，再被中央回收」的過程，指出毛里雖使用周邊視角，但她的問題意識尚未完全脫中心化。(村田，1999:201-204)綜上所述，毛里在民族研究中雖有意識地使用周邊視角，但她的問題意識已預設了國民統合與形成之必要性，並暗示透過民主主義解決民族問題之道。此外，周邊視角不僅應用在毛里的少數民族研究，也帶給毛里後期的亞洲學研究不少啟發，此將於後面章節討論。

第四章 調和論的嘗試—現代中國政治

本章的主要目標為透過整理毛里的中國研究成果，以做為探討毛里的中國研究之特色，並試圖回答毛里心中的中國像，以及她的中國研究對當代日本中國學界的影響。

第一節 理論化的嘗試，宏觀性的探索

毛里的代表作之一的《現代中國政治》(1993年初版、2004年改版、2012年再改版)，對中國共產黨與國家間的權力關係進行全面性的研究，此書雖為概論性質，但其蘊含的社會科學理論意識，確立了毛里在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地位³⁶。對毛里而言，從她這個世代開始是與中國沒有因緣的世代，並開始與傳統日本東洋學斷絕。此書透過將中國對象化，使日本可從自身認同中，將中國解放出來，代表著日本新中國觀的展現與現代中國學的確立。

壹、現代中國的研究途徑

《現代中國政治》採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希望現代中國研究能與其他領域研究者對話，並指出在實現經濟成長的時期，一定程度地犧牲政治的民主化，這在過去已有很多事例，如戰前日本、戰後的韓國、台灣與東南亞諸國。延續此脈絡，已將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關連模式化的比較政治方法可在中國分析上起到作用。

毛里指出現代中國有三個真實³⁷，因此可用下列三個座標軸進行中國的比較政治分析，(1)社會主義：與蘇聯研究比較，指出中國與蘇聯在政治、經濟與政治文化上有共通性；(2)發展中國家：與東南亞、拉美、印度研究做比較，指出

³⁶ 小島朋之認為毛里的研究成果應當被視為 90 年代日本中國政治領域的最優秀成果。(Tomoyuki Kojima, 2007: 139)

³⁷ (1)一元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2)作為發展中國家；(3)傳統中國的面向：皇帝與支撐其體制的官僚統治。

在經濟層面上，這些國家有共同課題；(3)傳統中國：傳統中國的歷史研究有助於理解現代中國。

毛里在奧森伯格在 1970 年整理出的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六種途徑：(1)歷史途徑、(2)現代化途徑、(3)官僚機構模型、(4)極權主義模型、(5)比較共產主義途徑、(6)革命社會途徑的基礎之上，指出在 80 年代後，為因應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需增加兩種新途徑：政治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途徑與體制轉型理論途徑。

毛里在此書試圖以客觀、相對化的角度來認識中國，併用了前述的比較共產主義途徑、現代化途徑與歷史途徑，並試圖統合之。前兩者是跨國的橫向式比較，後者是在中國長久歷史的時間軸上進行縱向比較，以抽出中國政治中的一般性與固有性。(毛里和子，2004：3-12)

貳、中國的變與不變

毛里將現代中國史區分為六個時期：(1)1949~53 年的體制過渡時期、(2)1954~57 年：黨代行主義的制度化(蘇聯型體制)、(3)1958~65 年：黨的一元指導時期(毛澤東型體制)、(4)1966~1977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非常時體制)、(5)1978~80 年代的四個近代化時期(往威權主義體制轉向)與(6)1990 年代至今：脫社會主義時期(威權主義的開發體制)。(毛里，2004：23-25)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中國經濟不斷成長並開始活躍於國際舞台，於此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社會發生根本上的變化，但一黨專政與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體制基本上沒有產生動搖。特別是在制度層面上，中國主要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仍停留在 50 年代建立起來的體制，改革開放的相關政策並無制度化。因此毛里指出在中國發生巨大轉變的同時，也一定要注意其沒有轉變的部分。

「變」的那一面主要體現於政策與結構。毛里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可分為三個階段的變動，第一階段是第一次結構變動，也稱為「脫社會主義」時期。毛澤

東時期的二元結構的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開始向三元結構轉變。80年代中期開始的村民自治運動顯示中國朝中央/地方/基層的三元結構的轉變。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雙方相互滲透與共棲的領域不斷擴大的結果，在各領域出現了三元狀態(如表 2)。(毛里和子，2012：6)



表 2 中國結構變動概念圖

舊二元結構	新三元結構
國家/社會	國家/半國家、半社會/社會
中央/地方	中央/地方/基層
計畫/市場	計畫/半計畫、半市場/市場
城市/農村	城市/半城市、半農村/農村
工人/農民	工人/農民工/農民

資料來源：(毛里，2012：7)

90年代後半期開始改革開放進入了「資本主義」化的第二個階段，預示了下述第二次結構變動。首先是「突破性」變動，如國有企業的民營化與自發性的利益集團的出現等，其次出現了最低限度的制度化，如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用制度與法律來確定人事權、財政權、資源利用權等，以及領域變動間的相互影響，如經濟的分權帶來政治的分權，最基層的自治帶來縣級的自治等。可視為蘊含體制變化契機的變動(毛里和子，2000b：7)

在第三個階段，毛里預告改革開放將帶來體制的變化，包括民族市場的形成、土地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轉換、威權主義體制向民主主義體制轉變等體制變化。毛

里曾預想，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中國將走向第三階段的結構變動，但是實際上還沒有發生。但是，中央/地方/基層，國家/半國家/社會，城市/半城市/農村此三元「結構」，與其稱為過渡期，但由於三元結構要發生變化需時甚久，意味這一「結構」將長期存在於中國三元結構性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變革中，所以毛里認為，再以過去二元或二元對立軸的方式解讀現代中國，有必要用三元結構的觀點進行深入的分析。(毛里和子，2012：7)

參、對歐美中心的民主理論之反思

毛里最後提出民主主義的陷阱，指出「西方定義下的民主主義」測量方式是有風險的，可能造成錯誤認識。市場化與民主化是西方價值與目標，對中國而言這並不是自明的道理，發展過程也不需要一樣。在包括中國的東亞比較政治中，如果以歐美民主主義為測量基準，將造成東亞政治分析中，將國家貼上「無自由的民主主義」、「準民主主義」或是「有缺陷的民主主義」傾向。做為理念的民主主義是普遍的，但是民主主義的制度與體制可以有不同的具體形式。例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03年初版的「世界的自由2003年」中，評價東亞各國中北韓與中共同為不自由國家。這種將中國與北韓視為同質·同等的存在之觀點，使毛里感到強烈的違和感，認為這種認識可能會忽視在中國發生的本質上的變化，並誤判未來的方向。(毛里和子，2004：290-291)

另外關於民主化與自由化之間的關係，毛里以自由之家發表的「2011年亞洲各國自由度調查」為例，對中國被評為「不自由國家」感到疑問，毛里認為雖然在中國沒有多黨制與自由公正的選舉等民主主義要素，但並不意味著中國無法實現自由化，事實上在21世紀的中國政治社會，若不牽涉到政治組織與組織活動，政治言論的發表可稱為相當自由，媒體也在一定程度上更佳的多元化。毛里指出市民社會的自由化並不一定與政治的民主化直接相關，甚至有可能實現無民主的自由。(毛里和子，2012：308-310)

第二節 中國社會主義的轉型



毛里的中國研究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特別是對中共的黨國體制進行全盤性的考察。在本節以毛里對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思想—馬列主義自 1910 年代起在中國的轉型做為她嘗試客觀化中國研究之實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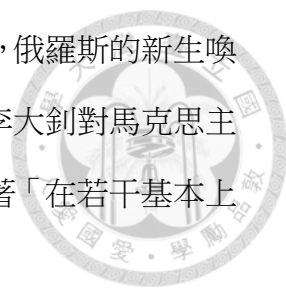
毛里在「中国にとっての社会主義—ある中間的評価」(1992)一文中試圖解答「究竟社會主義對中國而言是怎樣的的存在？」一問。她指出自 1910 年代末，中國的思想家與革命家在接觸到社會主義時，對之加諸了下列期待，從外來的壓迫下解放、脫離貧困、實現國民統合與國家統合。在中共建國後的 1950 年代末，又加上了經濟成長(追趕先進國家)。而毛里想釐清的是，當毛澤東等中國的知識份子為解決上述課題而選擇了社會主義作為解答，那麼社會主義對於解決這些課題是否有效，以及在實施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內涵發生何種變化。

毛里指出社會主義對中國發揮的作用特別體現在下列層面，思想、運動、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以及國家發展戰略，認為中國在這四項層面接納了社會主義，且隨著時間因應不同的課題吸收了社會主義並加以轉化。毛里認為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歷經了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儒教社會主義以及脫社會主義等階段。

在社會主義轉型的第一階段(1910~1940 年代)，中國在思想與運動層面上吸收社會主義。首先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在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最早受到社會主義思想³⁸深刻啟發的是李大釗與陳獨秀。毛里指出由李大釗吸收馬列主義的過程中，可發現兩個中國式的特點，其一為強調馬列主義的國際主義，也就是朝民族解放的面向傾斜。另一個特點為在李大釗的早期思想中，對於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論反應特別強烈³⁹。

³⁸ 此時被稱為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

³⁹ 李大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時，認為階級鬥爭像一條金線，把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從根本



毛里認為在中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偏向民族解放的原因是，俄羅斯的新生喚醒了同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共有的情感。因此，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偏重於國際主義、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論，也意味著「在若干基本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


而且雖然 1920 年代初開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界成為主流，但這並不是眾多理論之間論戰後的結果。在此毛里引用中國思想家李澤厚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主要是因為馬列主義有實行的可能性，而且已吸收成果(十月革命)轉換為具體行動指南與革命的戰略、戰術」。也就是在 1920 年代的中國，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實際行動的指南而吸收，無意識地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在第二個層面，中共發起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可視為將運動的社會主義滲透進中國的過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型態除了在 1940 年代後強調幹部的道德這點上具備了中國特色外，其他可稱是忠實地繼承了列寧的先鋒黨模式以及共產國際理論。此外與之前不同，毛澤東開始進行有意識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新民主主義論》可視為將馬克思主義完全中國化的著作。

作為運動的社會主義在民族解放面向上相當有效，貫穿了近三十年革命救國的過程。20 至 30 年代的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迫使志於變革的中國人民都服膺於「救國」口號⁴⁰，而抗日戰爭的勝利與 1949 年的建國也就意味著「救國」目標的達成，代表中國吸納的社會主義是具備有效性的，因此毛里認為此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亦可稱之為「民族社會主義」。但這也造成原初社會主義具有的思想性質褪色，而被降格成民族革命的行動指南、戰略與戰術。

上聯絡起來。(李大釗，1984:50)

⁴⁰ 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996)一文指出「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



中共建國後，1953 年至 1956 年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此時社會主義作為體制確定了黨的代行主義(以黨代政)與一元集中體制兩項方針。在之後的中國，黨的代行主義與黨國合一成為現實，毛里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此體制與史達林時期的蘇聯是相通的，同樣是名為權力集中，實際為個人獨裁的體制。

毛里認為此「國家社會主義」對建國初期就面臨冷戰與圍堵的嚴苛國際環境的中共而言，無可否認是相當有用的。特別在政治上，透過黨的一元指導、集權的政治體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集結社會資源，強力促進國民的凝聚與統合。但另一方面，黨國合一除了帶來民主主義的閉塞與自律社會的衰退外，尚有兩個問題。其一為「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在開始朝向經濟成長時就變成桎梏，而更根本的問題是，1953 年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定是否妥切。毛里認為在 1987 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社會主義階段論」，事實上就是對 50 年代社會主義選擇的自我否定。

歷經「民族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階段，中國原則上完成了獨立與國民國家統合等課題，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之後中國為追求經濟成長，追趕超越先進國家之目標，加上史達林模式的發展戰略在非戰爭時期已無用，產生了中國變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毛里指出有三個變種，大躍進政策、文化大革命與鄧小平的現代化政策。毛里認為大躍進政策與文化大革命都一定程度呈現出中國的特質，如大躍進體現了中國的唯一志論 (Voluntarism)，而在文革時，毛澤東塑造個人崇拜，如傳統中國皇帝的作風則顯示出毛澤東的權威由魅力型倒退至傳統型權威的過程。此外，原本中國化的社會主義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概念即相當強烈，在文革時期此平等主義又更加強化。這些都顯示出中國社會主義中傳統儒家思想的特質，毛里稱之為「儒家社會主義」。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傳統面向，毛里將中國與越南加以對照，指出社會主義在亞洲的價值，相對於馬克斯的崇高理念和科學化的唯物思考，更著重於民族主義與道德層面。社會主義在亞洲推進的過程中，統治者/被統治者這傳統結構並無改變，以及相較於作為政治主體參與政治，民眾更偏好開明領導人和清廉的官僚，尋求道德統治，毛里稱之為「亞洲型社會主義」。(毛里和子，1990b:88-89)

關於 1978 年的現代化政策，毛里認為不同於上述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與「儒家社會主義」，是另一變種，亦可視為「脫社會主義」階段。80 年代後的中國開始出現經濟社會的多元化—「受限的多元主義」與脫意識形態，強調實用主義等特徵，顯示了中國的政治體制脫離了傳統社會主義，既非極權政體也非民主政體，而是朝威權體制轉型⁴¹。當中國的社會主義將現代化視為最大課題時，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轉型已終結，至此之後，以社會主義途徑分析中國將益加困難。毛里將改革開放 1978 至 2008 年這三十年劃分為「脫社會主義」時期與「資本主義化」時期，認為現在已形成「官僚資本主義」。(毛里和子，2010:17-18)

關於中國的未來，毛里認為民主化是不可避免。(毛里和子，1990d:149) 特別是面對民族主義向心力的消逝與黨內的腐敗，「亞洲社會主義」的兩個主要價值「抵抗外敵的民族主義」與「統治者的高尚道德」皆喪失後，其權力正當性遭遇到重大挑戰，天安門事件即為一例。(毛里和子，1990b:89)而毛里認為民主化過程中需要過渡的體制，提出中國型複數主義—由統合主義建構的共產黨主導協商政治體制，透過容許黨內的多元主義，給與非共黨勢力一定的政治參與，進行利益集團的組織化等，可能成功實現共黨主導下的協商架構。(毛里和子，1990c:10)

由上述的整理可看出，毛里將中國的三個真實—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

⁴¹ 但毛里指出在鄧小平時代威權體制的確立是失敗的，首先威權體制是「傳統權威崩解的過程中的過渡」，具有過渡性與不安定性。其二，在台灣與韓國的開發獨裁體制得以成功的原因是當時東西對立的國際環境以及透過抵抗外敵(中國大陸和北韓)的民族主義凝聚向心力。但在 80 年代的中國，以上兩個條件皆不存在(毛里和子，1991:25-26)

與傳統中國這三種框架整合在一起，進行綜合性的考察。在中國社會主義的轉型過程中，可發現這三個真實相互交錯，傳統中國的特性影響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面貌，而國家發展作為目標，也影響到中國對社會主義的詮釋。在中國，社會主義是解決特定課題的工具，特別是脫離被壓迫的狀態。毛里透過功能主義途徑將社會主義進行解構，社會主義在中國化的過程中浮現的實踐性格掩蓋原初的理念性，社會主義作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反官僚的道具，在 50 年代中共完成獨立建國和建立體制目標後，此後社會主義功能在經濟發展上就已經出現瓶頸，漸失去功能轉換的能力。而儒家社會主義就是毛澤東等人面對瓶頸，進行中國社會主義變種的嘗試，但大躍進與文革的結果皆顯示了社會主義功能轉化的失敗。直到 1977 年鄧小平揭櫫現代化政策後，開始進入「脫社會主義」階段。由毛里對中國社會主義轉型的研究，可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性格逐漸淡去，而漸朝向普通發展中國家邁進。

第三節 亞洲裡的中國—中國研究的亞洲化

如上一節所述，毛里很早就提出亞洲性⁴²的概念，並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進行比較研究，但正式提出中國研究亞洲化的主張是在「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

2007 年毛里開始進行「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現代中国地域研究拠点プログラム)，計畫背景為由於中國處於劇變且呈現無限多樣化的趨勢，為了更適切地了解與把握中國，啟動此現代中國區域研究合作項目，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區域研究，取代過去只限於某一國家的區域研究。此計畫共有四大課題，首先是將分散各處的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的各項活動進行整合並加以組織化，透過據點間的網絡連結，強化研究、教育與情報面的合作。其次是面對「中國向何處去」

⁴² 毛里在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轉型時即提出「亞洲的落後性」，如統治/被統治結構、強力集權以及社會欠缺自律性的政治參與等，指出在社會主義實踐的過程中，這些落後性沒有被摧毀，反而存續下來。(毛里和子，1990c:9)

此問題，運用人文、社會、自然等各學科來對中國進行綜合性研究。除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外，並系統推動中國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的聯合研究活動。第三為通過召開各研究基地之間的聯合研究會、建構訊息網絡以及共同調查研究來培養具國際水平的年輕一代中國研究人才。最後為提高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各種文獻、訊息與數據的透明度，並促進相互利用。(毛里和子，2008：106-108)

此計畫第一期為期五年(2007 至 2012 年 3 月)，在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慶應大學、東京大學、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東洋文庫等六個機構展開，各自的研究主題分別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研究」、「以人文學的角度分析現代中國的深層結構」、「中國的政治治理」、「中國經濟的成長與安定」、「中國社會的開發與環境保護」與「促進現代中國研究資料的收集和利用、推進現代中國的資料研究」。而早稻田大學的亞洲研究機構的「現代中國研究所」被選為核心基地，負責整個研究網絡的營運。第一期計畫結束後，第二期的五年研究計畫隨之啟動，並新加入二個合作研究機構—愛知大學與法政大學，其組織結構與研究課題如圖 2 和表 3 所示。由上述整理可發現此計畫主要目的為促進日本當前中國研究機構之間的橫向連結與合作，毛里認為在此方面日本遠遠落伍世界，此缺乏合作的傾向也使得日本的中國研究顯得無效率。

由於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轉型期」，把握中國更加困難。這些困難包括其巨大的規模、現代中國具有的多重屬性⁴³、地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以及每個領域各有不同的變化方向，如經濟上是「洶湧澎湃的市場化」，政治上卻是「回歸到傳統」。(毛里和子，2008：114-115)

⁴³ 曾為世界文明古國的歷史及其遺產、半殖民地以及後殖民國家之特性、曾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及其遺產、身為一個龐大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 GDP 即將排行世界第三(2008 年)的核武大國。

圖 2 「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組織圖



資料來源：人間文化研究機構(NIHU)現代中國地域研究⁴⁴

這些研究困難使毛里認為有轉換現代中國研究典範的需要，並整理出當前中國研究的四種模式。首先是通常的現代化模式，主張中國的發展方向為民主化與市場化。其次為回歸傳統的模式，認為「民主化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強調回歸至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才是中國未來的出入所在。第三是東亞模式，毛里認為將東亞模式視為中國的目標模式觀點還是有用的，特別是運用東亞地區的歷史經驗去投射當前與未來的中國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最後是「中國就是中國」模式，強調中國的固有性，雖很有魅力且容易操作，但仍有許多理論、研究方法待建立。(毛里和子，2008：117-118)

⁴⁴ 參閱人間文化研究機構(NIHU)現代中國地域研究網站：www.china-waseda.jp。

表3 「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研究主題



研究機構	第一期計畫(2007-2012)	第二期計畫(2012-2017)
早稻田大學	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研究	中國「超大國」化論研究
京都大學	以人文學的角度分析現代中國的深層結構	中國近現當代史的重層結構
慶應大學	中國的政治治理	轉型期的政治與外交・安全保障
東京大學	中國經濟的成長與安定	中國・東亞之長期經濟發展—工業化的軌跡與展望
地球環境學研究所	中國社會的開發與環境保護	全球化的中國環境問題與東亞成熟社會前景之探索
東洋文庫	促進現代中國研究資料的收集和利用、推進現代中國的資料研究	日本的現代中國資料的資訊・研究中心的建構
愛知大學		關於日中關係變化的結構變遷的實證研究
法政大學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社會學實證研究—中南海研究

來源：作者根據人間文化研究機構(NIHU)現代中國地域研究網站整理

毛里的中國「亞洲化」成果，呈現在 2012 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政治第 3 版》，她試圖依照比較政治學理論來分析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毛里指出由於中國非常龐大且歷史悠久，研究者容易被迷惑，因此過去在現代中國研究領域很少有真正的比較研究。而進行比較研究時，比較對象的選擇除了蘇聯與俄羅斯外，還有一個有用的比較是與亞洲各國的比較，也就是中國的「亞洲化」。毛里指出主持 21 世紀 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的研究案(2002-2006 年)的過程中，被要求進行跨學科研究，此研究經驗對她的中國研究非常有益，也使得使得中國與現代亞洲的比較研究、中國研究的相對化成為可能。

毛里指出將中國納入亞洲框架後，發現當代中國的政黨體制與開發獨裁期東南亞各國的政黨體制有相當的類似性。在此毛里引入日本國際政治學者藤原歸一提出的「政府黨體制」⁴⁵概念，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描述為「政府黨體制」的理想形式，指出黨在「黨、國家、軍隊」的三角關係中處於核心地位。東南亞的部分「政府黨」，特別是印尼的專業集團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有著很強的類似性，黨不僅滲透到國家，而且滲透並控制整個社會。此外，如果將日本的自民黨一黨優勢體制與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加以比較，也從中可以分析「亞洲型政黨體制」，並在其中將中國定位。毛里認為透過中國的「亞洲化」，不僅提供了分析中國的新工具和新武器，也帶給社會科學新的問題。(毛里和子，2012：8-13)

第四節 小結

毛里的中國研究對現代中國的政治過程、國家黨軍隊與政治社會做系統性的分析，在對象化中國的同時也承認中國的固有性。過去日本的中國研究受限於冷戰期間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歷史問題的糾葛以及在中國發生的劇烈變動而難以客觀認識中國。(毛里，2002c：9-10)特別是日本與中國之間雖在文化的牽絆上很強，

⁴⁵ 藤原歸一指出「政府黨」與政府和商業部門建立密切的聯繫，通過壟斷政府的行政資源並將之用於自身組織、人員與財政支出。一旦政府黨掌握政權，雖然形式上國家還維持多元競爭的政治體制，但政黨政治漸漸會被排斥出去。藤原將它定義為「政府黨體制」。

但是有深刻的文化牽絆並不代表能相互理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日本與中國各自形成自己的文化、政治。加上過去侵略的歷史，強烈的贖罪意識在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造成很大的影響，有時無法客觀的觀察中國。這種贖罪意識，形成對新中國一切肯定、讚揚的思潮，毛澤東時代的華麗的意識形態與道德更加助長這種傾向。1972年日中國交正常化後，可說日中普通對等關係的開始。在此基礎之上，毛里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對象化中國，自過去日中兩國間彼此相互抵抗與掙扎的螺旋解放，展現日本的新中國觀。

由毛里在研究途徑的選擇上可看出若干調和論的傾向，試圖納入多種研究途徑以掌握處於巨變中國之實像。鑒於美國的中國研究與區域研究有顯著的理論化傾向，如杭庭頓(Samuel Huntington)指出「中國研究學術化」，政治學、社會學理論能貢獻在中國研究時代的來臨，毛里也開始著手於理論化的嘗試。《現代中國政治》2004年改版後，新增的「東亞中的中國政治」即為理論化試驗的成果，希望建立出適用東亞與中國的研究模式，並在2012年新版的《現代中國政治》，進一步提出中國的「亞洲化」路徑。過去關於中國的政治現象，日本的中國研究往往僅從與中國有關的政治史或政治文化的背景出發，尋找解釋因素，而不善於透過國際政治理論的分析框架或模式來進行分析。(Tomoyuki Kojima,2007:132)直到90年代，日本的中國政治研究開始出現政治學理論意識，毛里即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先驅者推動中國研究的理論化。

同時整理毛里的中國研究成果後，也可觀察到其參照系由(前)社會主義國家到東南亞國家的轉變，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隨著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蘇聯瓦解及冷戰結束，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色彩漸漸褪色，社會主義視角作為認識中國的方式已有所不足，此時新的視角「亞洲裡的中國」開始出現，毛里的研究即促進了日本中國研究界中參照系的轉變。

第五章 遭遇亞洲—現代亞洲學

在毛里的研究歷程中，她試圖不斷去找出研究中國最適切的方法。雖然毛里認為應將中國對象化，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但她同時也承認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多仍以歐美中心，其適用亞洲亦或是中國的妥切性不無疑問。在進入 21 世紀，毛里因緣際會接下亞洲學相關之研究計畫，開始試圖創設出能掌握現代中國動向的研究典範，這個研究典範即為「現代亞洲學」。本章將整理毛里對過去美式區域研究的反省，以及提出的「現代亞洲學」之內涵，最後將檢證毛里將日中兩國置於亞洲框架下，對日中關係再建構的嘗試。

第一節 方法論的反省—

現代亞洲學的創生

壹、作為解答的亞洲

自 70 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革命史觀的沒落，日本中國學界進入價值多元時代，歷經了約十年的「缺乏全體理論」時期；同時，區域研究也開始進入知識體系方法論的多元時代，接納政治學、國際關係、經濟學等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成為重要方法論來源，試圖建立綜合視角。(邵軒磊，2009:187,206)

但這些自歐美引進的理論，其西方中心的傾向在亞洲各國飽受質疑，特別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方面，亞洲學界一直以來是理論的消費者而非製造者，從亞洲各國國際關係學界作品中佔大多數的現勢分析中可發現，西方已經成功地將自身對國際關係的理解加諸於非西方世界的心靈與實踐中。(陳柏宇，2013，10)在日本、台灣或新加坡等東亞國家都有學者對此傾向進行批判，並試圖找尋解答⁴⁶。

⁴⁶如2005年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賈拉南(S. Rajaratnam)國際研究學院舉辦的「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從亞洲反省亞洲」的專題討論會，新加坡學者阿查亞(Amitav Acharya)與英國學

在日本學界，也對此西方中心主義或歐美中心主義的研究傾向進行檢討與反省，如日本學者加加美光行認為日本採用區域研究（觀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導致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帶有目的論價值判斷與東方主義式的思維，並存在方法論上的缺陷。對此方法論上的不足，加加美倡導建立「國別學」的中國學來取代「區域研究」的中國學，使目的與方法達到一致。(陳綺齡、邵軒磊，2011)

貳、與亞洲學的遭遇

與加加美不同，毛里開啟亞洲學研究的契機源起於2001年，文部科學省為設立世界型研究據點，公布21世紀COE計畫，當時早稻田大學為爭取成為研究據點之一，而請託毛里擔任計畫代表。(平野健一郎，2007:24)關於被學校選中擔任計畫代表的原因，毛里說明「像COE 這樣大型的項目，其申請可能取決於.....帶頭人要看有無從事大型研究的經驗，是否對文部省有過影響，在學會中是否有影響力等。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非常希望能申請到這個大型項目，而我有擔任過幾個大型研究項目代表的經驗，對文部省及學術振興會有著一定的影響力，所以就被選中了。」(石之瑜等編，2011:327-328)而研究計畫的主題為何選擇亞洲學，毛里解釋「當問及申請什麼內容時，系裡領導表示並沒有什麼既有方案。於是我去平野健一郎先生處請教.....，他建議說，無法組建全校的研究現代中國的專家組，但早大有很多現代亞洲研究者，所以可能開展『現代亞洲學』。」(石之瑜等編，2011:328)

選擇亞洲學作為研究主題的背景因素，除了任職學校本身條件的限制外，還包含

者布贊(Barry Buzan)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因此藉由會議探討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在亞洲各國發展的情形，推敲亞洲原生國際關係理論缺乏的原因，並且企圖從亞洲各國歷史與哲學傳統中尋找理論的可能性。2009年底阿查亞與布贊聯合主編，出版《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 on and beyond Asia*)一書，意圖由亞洲各國其本國或區域的歷史、文化與哲學出發，探討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可能，而如同書名，該書主旨在於希望能夠從亞洲觀點出發並且「超越」亞洲觀點。(陳柏宇，2013:1)

時代因素，特別是 21 世紀後，不論日本政治界或學界對東亞共同體和東亞整合論等議題日益關注。加上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研究，有開始反省歐美式研究方法，以及面臨社會主義浪潮後退等國際情勢的改變，中國的比較參照對象由俄羅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轉換至東南亞國家之趨勢。在這種亞洲學整體思潮脈絡的浮現之下⁴⁷，毛里順勢提出「現代亞洲學」研究計畫，提倡自者研究的立場，透過「亞洲內部觀察」的積累，開發出在「不斷生成的亞洲」中，「從內部出發」的方法論。(堀內賢志，2007：91)毛里如此定義地域研究，「試圖對超越國家的地域諸象，進行全體掌握的途徑，透過他者的視點再檢視自身的跨學科研究」。關於「地域」與「跨學科」的必要性，毛里認為採用地域研究的立場，透過跨越國境的視點，或許可成功擺脫「國家」概念的束縛。此外，經由將西方式社會科學相對化，再檢視人們的行為與價值的過程中，也可豐富既存社會科學的內涵。

(毛里和子，2002b：192-193)

參、「現代亞洲學的創生」計畫成果

「現代亞洲學的創生」在 2002 年啟動，該年早稻田設立現代亞洲學研究院，同年 11 月開始發展 21 世紀 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的研究案，目標為超越以往出自歐美的社會科學，創造新的「一體的亞洲」⁴⁸的論點。此計畫於 2007 年 3 月完成，以毛里為編集代表，於 2006 至 2007 年出版《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共四冊⁴⁹，在事後獲得極高評價。

在此計畫中的所謂的「亞洲」限定為東亞，建立新亞洲學其第一步即為探討東亞共同體的設計，並以整體分析為志向。主要目標為開發能解析「現代亞洲」的研究方法。此計畫認為進入 21 世紀後，「亞洲」作為一個實體的整體地域登上

⁴⁷ 邵軒磊指出日本中國學界在歷經約十年的「缺乏全體理論」時期後，以溝口雄三與濱下武志在 1989 年前後提出的「亞洲基體論」與「朝貢體系論」為轉折，亞洲作為日本如何面對自身定位與如何面對中國的解答，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系譜開始朝亞洲學發展。(邵軒磊，2009)

⁴⁸ 從過去「亞洲乃一體」(アジアが一つ)，轉變為以機能面為主的「一體的亞洲」(一つのアジア)。

⁴⁹ 此系列書中所指的「東亞」為東北亞與東南亞結合的區域，具體而言為 AESAN+日中韓。

國際舞台。而分析此「新亞洲」，能否運用以往國別式的區域研究並將結果總合累加起來，毛里對之抱持疑問。因而希望開發出能有效分析「整體亞洲」的研究方法，並試圖於新亞洲學中整合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政治社會學與國際關係。

「現代亞洲學」的三個基礎包含，確認東亞形成一個區域的過程並開發解明此「一個亞洲」的學問；不採用劃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他者研究」，而是站在亞洲之中的「自者研究」；所謂「現代亞洲學」並不只是建立在至今共有的歷史與傳統，也包含亞洲成員共有的目標與課題，此主要課題即為追趕歐美，脫離後進性。(毛里和子，2007a：46)

毛里歸納出六個「亞洲性」(asian-ness)之特徵，包含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相互滲透(政府黨體制)；相對於歐美的「契約」式社會關係，東亞為「關係性」網絡；集團主義與扈從關係；高度混雜性背景帶來的價值寬容；東盟模式(ASEAN way)⁵⁰；相較於現實主義者的理解，ASEAN 是由一群較弱勢的國家主導而成，此試驗開創了創造亞洲式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性。(毛里和子，2007a：46)研究成果之一的《図説 東アジア・ネットワーク解析》以 19 國(包含狹義東亞國家 ASEAN+3 與 6 個關係區域國家：印度、俄羅斯、蒙古、澳洲、紐西蘭與美國)為對象收集了 1980 年代至 2004 年，共 25 年的政治、安全保障、經濟、社會・文化領域。此大規模的情報收集與東亞固有的「複合網絡」觀察，為日本學界的初次嘗試。並將這些情報數字化進行社會學的「網絡解析」，提出下列觀察。

除去軍事政治領域外，1990 年代後半以降，可發現東亞區域的「複合網絡」結構。特別是社會・文化領域與經濟方面區域內相互依存的深化，進行區域交流。雖然這些網絡逐漸往非階層式的「分散型」發展，但在軍事・政治領域依然停滯在分極型與分散型之間。在境內關係不斷深化的同時，也不斷向外擴張，此意味著東亞的領域仍為不定型。同時關係也仍未固定，在狹義的東亞網絡中，有中心

⁵⁰ 對成員國內政、領土和主權採取不干涉的原則。

移動與中心複數化之傾向。相對於社會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仍在「區域化」與「東亞化」階段，經濟領域成為先行者，事實上已進入統合階段。毛里指出這種先從經濟共同體至政治共同體，再成為社會·文化共同體的過程，隱含著與一般機能主義途徑不同之路徑的可能性。(毛里和子，2007d：15-16)



第二節 亞洲學脈絡的承轉

90年代以來，以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論為首，此時亞洲學發展有兩種趨勢，其一為重拾戰後所忌諱從事的亞洲社會調查，以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為核心研究方法的社會調查進入亞洲研究，使亞洲變成了田野調查的對象。其二為更多學科整合與多元要素被融入亞洲學中，日本有一系列「亞非研究所」，使用的即是「跨學科式整合方法」(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這些對亞洲研究的視角轉變中，同時所隱含日本對於自身認同的基礎。(邵軒磊，2009)亞洲學的再提出也顯示了日本在面對中國崛起的焦慮⁵¹。

而毛里提出的現代亞洲學延續「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提出的「混成亞洲」⁵²，以「東亞區域化」為核心，提出了六個亞洲觀(詳見表 4)。毛里引用國際關係學者山影進的主張，指出地域的形成並不是基於內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而是由「關係」所構建，因此無一定界限，而亞洲即為一個被創造出的場域。關於福澤諭吉的「脫亞論」(1885年)、樽井藤吉的「大東亞合邦論」(1893年)、韓國安駒壽的

⁵¹如東亞整合論出現在 ASEAN 開始運作與 1997 年金融危機以後，日本以「ASEAN+3」的立場出發，討論在金融、貿易、投資甚至安全保障上的實務功能性合作，以歐洲統合模式開始推進「東亞高峰會」與「東亞共同體」。日本前首相小泉在 2002 年的「十加三」會議上對東亞共同體的建議，可發現其核心主張：擴大共同體範圍、開放性的共同體與強調普世價值(如民主和人權)等，在在都是針對中國而來。(王勇，2005、吳玲君，2007、邵軒磊，2009)

⁵²「東亞共同體評議會」為日本對東亞共同體研究的代表組織，評議會提出的「混成亞洲」概念，強調亞洲在各種宗教、地理、民族、政治制度與文化層次上的多樣性，並強調在追求統合時不能一味只要求「統一」。(邵軒磊，2009)。

「日清韓同盟論」(1900年)、岡倉天心的「東洋的理想(亞洲乃一體)」(1903年)等這一系列的亞洲思潮，毛里認為過去100年間，實際上不存在亞洲住民可共有的亞洲。亞洲既不是實體，也缺乏地域性的認同，只是住民所各自描繪出的一種想像，如「大東亞共榮圈」即為一種危險的虛構。但毛里認為即使原初是虛構的概念，一旦開始相信之，在現實的場域也會產生力量。換言之，不存在無法支撐虛構的現實。毛里指出由「虛構的亞洲」的視角出發，重新檢視亞洲的近現代史具有重大意義，因為經由「虛構」，使尋找「創造」亞洲之道成為可能，也是通往亞洲以自己為主體，進行自我解剖、自我規範的「現代亞洲學」入口的途徑。(毛里和子，2004c:168)

表 4、現代亞洲學的六大亞洲觀

	名稱	主軸	內涵
一	虛構的亞洲	作為記憶、形象、世界觀	強調各文化的亞洲觀
二	符號的亞洲	作為政治、國家符號	強調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為了擴張所使用的符號亞洲
三	空間的亞洲	作為流動的空間	強調人、物、錢、資訊流動所需的地理與周邊性
四	認同的亞洲	作為文化發展基礎	強調傳統、風俗、國家制度等共通性
五	機能的亞洲	國家間合作	FTA、共同能源計畫、安全保障
六	制度的亞洲	更多主體層次的複雜機制合作	發展如 EU 的統合體

資料來源：早稻田大学 COECAS オフィス，2005：2

而東亞此新地域的形成，即為非傳統現實主義下的強國—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 諸國主導下的實踐性成果。毛里認為東亞這個嘗試，可作為國際政治理論新的素材，開拓亞洲型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性，強調東亞共同體不是「可能的」，而是必須要從意識上的「創設」。(毛里和子，2007c)

毛里的亞洲學在作為日本藉以對「內/外」對話的知識體系層面上，呈現了與過去亞洲學的繼承關係。作為對話知識體系而言，日本近代的東洋學就是透過

「對亞洲的研究」來重新定位舊有的帝國秩序。因此東洋(亞洲)作為近代日本表述之基礎，內容必須包含中國，但又不能以中國為主，因此亞洲學與中國研究，自始就產生了微妙的共變關係。(邵軒磊，2009)這種新舊亞洲學的差異以毛里提出的新區域主義為代表。(請參考表 5)

表 5、新地域主義比較概念圖

	歷史的亞洲主義	歐洲統合	東亞新地域主義
構造	霸權、垂直型	水平、對稱型	水平、非對稱型
原理	權力型	社會型	權力/社會型
對外關係	對抗型	共生型	開放型
價值	一元	共通	多元
認同	文化認同	政治文化認同	市場認同
國際系統	帝國秩序	後西伐利亞體系	新西伐利亞體系

資料來源：毛里和子，2007a:頁 48

由表 5 可發現，毛里提出的東亞新地域主義，在縱向上不同於以往的（中華或是日本帝國）東亞秩序，在橫向上不同於歐洲統合模式。毛里的新亞洲學，其主要的亞洲觀內涵繼承了戰前的區域研究，強調實態調查；也繼承了國策研究傳統。(邵軒磊，2009)毛里的亞洲學仍在發展中，其同時揭示了日本如何面對中國崛起的方法，此將於下節討論。

第三節 亞洲框架下的日中關係

日中兩國的相互認識一直是兩國關係的癥結，特別是自進入 21 世紀，過去曾經短暫冷卻下來的領土爭議、戰爭責任相關的歷史問題再度浮現，加上兩國在國際場域的權力競逐衍生的新爭端—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使日中關係進入到危險的階段。此背景使毛里感受到作為研究者之責任進而寫下《日中關係——戰後から新時代へ》一書。毛里認為過去日本缺乏對日中關係的深入研究，並指出停留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思維對日本是百害無一利，特別是「威脅」是相當曖昧模糊的概念，屬於知覺、印象範疇。難

道「認知」到某國對自身有威脅，就理應擁有以力量對抗該國的權利？(毛里和子，2001b:35)毛里認為對日本自身而言，透過發展健全的日中關係也可啟示日本未來方向。因此，此書與毛里過去的著作不同，寫作的初衷為「傳遞訊息」，特別是意圖與中方進行對話，相對於日中關係的應然面，更著重於實然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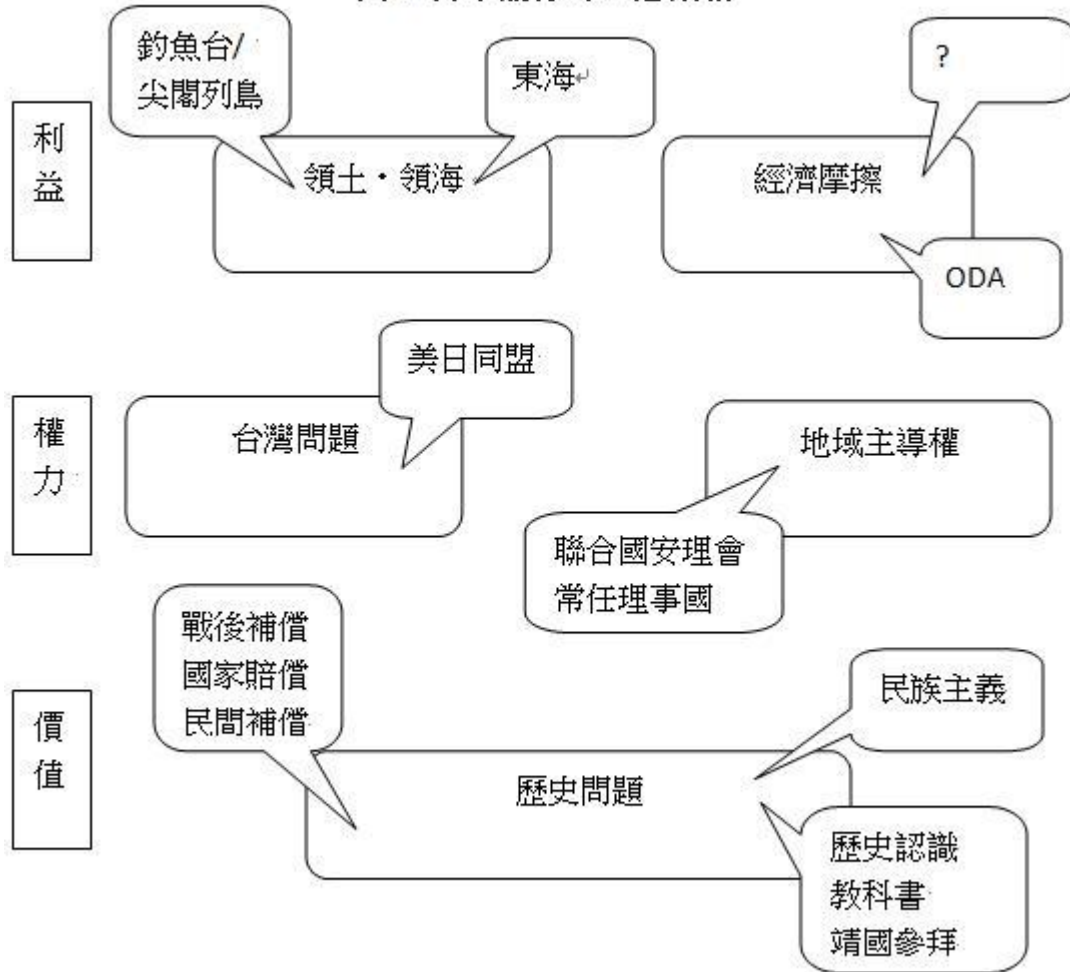
毛里將自中共建國開始的日中關係分為五個階段：(1)1949 至 1971 年的冷戰對立期；(2)1972 年後，70 年代的戰略友好期；(3)1980~90 年代的安定發展期；(4)1990 年代後半至 2004 年的結構變動期；(5)2005 年春的反日運動之後，兩國面臨重大的分歧點。毛里認為對於日中關係，兩國過去都停滯在「思考停止」狀態，日本的以對美關係與經濟發展為核心之基本戰略在戰後五十年間並無太多改變；而中國方面，由於歷史問題的有效性，持續以之為強力武器，置於對日關係的優先順位上，這種外交戰略思考的停滯阻礙了兩國關係的健全發展。(毛里和子，2004b:226-228)

毛里認為自 2005 年的反日運動後，日中關係進入到新的階段，結構也發生重大改變。首先關於行為者互動的變化，毛里指出政府、經濟界和輿論是日中關係的三個主要行為者，1972 年日中國交正常化時，中方的行為者只有政府與國營企業，並不重視國民觀感，兩國的交流僅限於兩國政府間的互動以及日本經濟界與中國政府間的交流。因此當時日中關係的行為者是非對稱的，相對而言互動模式也單純明快。但由 2005 年的反日運動可發現，大眾、輿論要素開始對日中關係有重大影響力，成為主要行為者之一。(毛里和子，2006a:205-207)特別在中國，中共在面臨社會主義的認同危機，選擇以愛國主義作為凝聚國民向心力的手段，但愛國主義是把兩面刃，中共在處理日中關係上也開始承受輿論的壓力。

毛里將日中關係的癥結分為三種不同層次的議題(如圖 3)，三個層次的問題相互糾結，難以解開。首先是處於底層，屬於基礎的價值層次，主要為歷史問題以及衍生出來的靖國神社與歷史教科書問題，環繞在歷史認識的差異與價值觀的

對立。第二層次是權力，特別是在亞洲太平洋地域的權力對抗，涉及台灣問題、美日同盟與日本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問題等，此層次牽涉到兩國對地域領導權的爭奪，相對於第一層次，此層次的問題更棘手。第三層次是圍繞領土、領海問題與貿易、經濟摩擦問題等具體利益的對抗。毛里建議將這三個層次的糾紛要素分解開來，每個層次的紛爭透過相應層次的對話來處理。(毛里和子，2006a)

圖3 日中關係的三層結構



資料來源：毛里和子，2007e：19

面對日中關係的分歧點，毛里提出日中關係的再建構，具體建議如下：關係的理性化；領導者的定期交流；對不同層次的問題，開發不同的管道來解決；關於歷史問題，可設置日中韓共同委員會，以長期的視野進行協議；日中(韓)在環

境、災害預防與救助、教育等領域進行政府層級的合作；最後提出建立紛爭解決的機制，強調構築「東亞共同體」多國體制之必要性。(毛里和子，2006a)毛里本人也投入到加強日中兩國相互認識與對話的工作中，其中「21世紀的亞洲研究者論壇(日本中國特別論壇)」(21世紀のアジアを考える日中研究者フォーラム)就是其具體實踐。此論壇自2001年11月起共舉辦6屆，由國際交流基金贊助，每年的預算額為1000萬日元，要求每年舉辦2次會議，希望透過提供學術交流的平臺使中國的研究者能對日本有更深入的認識。(石之瑜等編，2011:322)論壇組成成員由中國的國際政治與日本問題學者10位，及日本的國際政治與中國問題學者10位所組成，毛里負責日本方面的統籌。雙方學者在「不代表國家，站在自由的立場討論」達成共識。論壇為時3年討論的共同成果集結於由毛里與張蘊嶺共同編輯(2004)的《如何建構日中關係—邁向亞洲的共生與合作》(日中關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一書，收錄天兒慧、五百旗頭真、山本吉宣、王逸舟、楊伯江等日中學者對今後日中關係的見解。

除增進雙方的共同認識之外，毛里指出以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契機，中國認知到東亞各國的利益與安全是一體的，此後中國亞洲政策⁵³以東亞為核心，「回歸東亞」成為中國生存戰略的一環。(毛里和子，2004c:164)但與此相對，日本不但缺乏明確的對中與亞洲戰略⁵⁴，面對中國的亞洲戰略，日本反應遲鈍，一直處於被動的追趕地位。(毛里和子，2004c、2006b)對此毛里認為日本必須正視中國的崛起，並建立超越威脅/友好，競爭/夥伴等定型化的中國論述，構築日中與東亞各國彼此迴避紛爭，立足於現實的共同體，上述的「現代亞洲學的創生」

⁵³中國於90年代後半開始推行地域外交，其中「東亞」為中國亞洲戰略的核心，這跟中國自身的「大國」認識有密切關聯。但中國的地域主義外交對象是寬廣的亞洲，以自身為中心呈現放射狀，東亞只是包含中國的眾多地域的其中之一，其他還有中亞與南亞國家的合作也正在進行。(川島真、毛里和子，2009)

⁵⁴毛里以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在東亞高峰會的演說為例，其倡導的東亞共同體強調共同擁有民主主義和自由以及人權等普遍價值，但部分東南亞國家是否希望接納民主主義，毛里對之抱持疑問，其理念的有效性相當有限。(毛里和子，2006b)

的計畫即為毛里理念的核心。(毛里和子，2004c:165)

毛里提出東亞共同體作為日中兩國紛爭制度化的解答，但她同時也指出兩國懷有東亞認同感並不一致。關於日中兩國亞洲意識的差異，毛里認為日本從戰前脫亞入歐，到戰後脫亞入美，因而喪失了亞洲認同感。日人雖意識到自己身在亞洲，但對自身是亞洲人的意識有限。對日本自身而言，亞洲是不確定的，自我認同在亞洲(Asia)與亞洲—太平洋(Asia-Pacific)之間擺盪。而中國的亞洲意識（特別是東亞意識），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由於過去傳統中華的思考模式（朝貢體系）與大陸國家的習性，中國仍將東亞各國視為自己的「周邊」，而非將亞洲視為一個包含中國的區域。(毛里，2006)

總結毛里對日中關係的看法，其立足於現實面與實然面，偏重於政策建言性質，第三節提出的東亞新地域主義即描繪了毛里對東亞秩序的理想。毛里認為「東亞共同體」的創立雖有助於未來日中兩國關係的改善，將爭取國家利益的思維轉變為爭取「地域利益」。但毛里也指出「東亞」對日本與對中國的意義是非對稱性的。對政治非全球化的日本而言，東亞幾乎是日本唯一需處理的區域；但對中國而言，東亞雖然重要，但也只是其周邊地域之一而已，而且仍有許多其他問題阻礙著共同體的形成⁵⁵。

第四節 小結

自 1980 年代末開始，經歷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社會主義的挫折到中國的崛起等國際情勢的轉變，日本急需找到社會主義以外的途徑以解釋中國，在此背景下，日本興起了亞洲思潮。此 90 年代末興起的亞洲思潮不僅限於日本，亞洲各國學者開始意識到西方中心理論的局限與對自我認識的扭曲，並開始探討建立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性，各國學者皆指向了自身的歷史、哲學與傳統，

⁵⁵ 毛里認為主要的妨礙因素如下：(1)近代歷史問題造成的相互不信與猜疑；(2)近代東亞各國共有的強烈民族主義，造成東亞的割裂；(3)此地域的國家，其經濟、政治、軍事或影響力有很明顯的差距(非對稱性)(2005：1-5)。

作為發展不同於當代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資源，因此可以說是以文明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的選項(石之瑜，2011)。此時代需求加上毛里的任職校早稻田大學為爭取政府研究經費委託毛里提出研究計畫案，從而促成毛里式亞洲學的誕生。關於這些背後的動因，毛里自承「所處的時代對研究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無法跨越的。我認為，研究者本身已經融入了時代……，人們看似非常主動地從事研究活動，實際上則為大環境所左右。」(石之瑜等編，2011:299-300)

因此在這些背景因素之下，毛里順勢提出亞洲學，但其也開拓出與其他日本學者不同的方向。對照溝口雄三與濱下武志在亞洲的範疇裡消解、模糊中國；在毛里式的亞洲學中，中國作為一個普通的大國，其形象反而鮮明具體起來。

由「現代亞洲學的創生」到「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可看出毛里嘗試將中國研究放入亞洲框架的意圖。一方面強調「亞洲性」之存在與「亞洲模式」帶給社會科學新理論之可能；另一方面肯定以此亞洲框架，特別是以「政府黨體制」切入，去投射中國的現狀與未來。強調亞洲與中國是可相互映照的，如毛里在前述民族問題研究中提出創造擁有複層結構的領域統合之機制，此建議在亞洲學關於創造東亞共同體的方式時再度提出。此外承接毛里以往的認同/民族建構論主張，毛里在亞洲學中也闡明東亞地域與東亞意識的「構築」，主張透過實踐行動將「虛構」的地域與認同轉化為現實。

毛里的亞洲學亦可看出其一反過去對應用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的審慎⁵⁶，在其亞洲學的框架裡加入「亞洲性」之要素，強調東亞人民共有的政治文化，最後將價值放在以亞洲學為名的框架之上，試圖將日本與中國都納進此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毛里的論述中關於對中國與亞洲的研究，使用「中國研究」而不稱之「中國學」，使用「亞洲學」而不稱之「亞洲研究」，此若干反映了毛里作為社會科學

⁵⁶毛里曾評論「(政治文化)什麼也解釋不了。因此，至今為止我總是儘量不去碰觸政治文化。對白魯恂也持批判態度。」(石之瑜等編，2011:336)

研究者的身分，不使用涵蓋文史哲研究的「中國學」之話語，而其開展的現代亞洲學一開始即標明採取整合經濟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等社會科學理論，故並無此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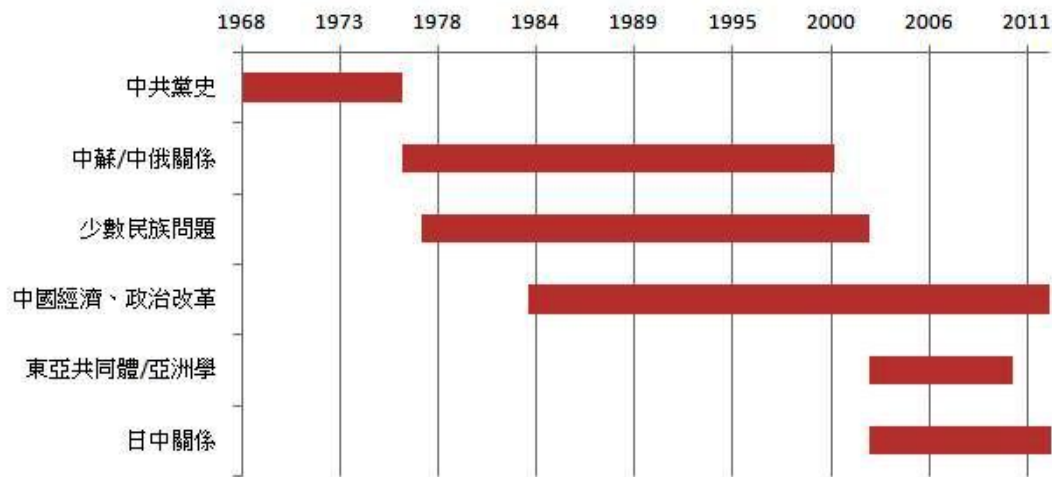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標示出毛里和子在日本中國研究的學術定位，並探討其研究在日本的中國學術社群之互動關係。透過檢閱毛里的學思歷程可發現，雖然在學生時代，由於當時中國具備的特殊性與神祕性使毛里產生深入認識中國的興趣，但由於受到在國問研的訓練影響，毛里雖出身於歷史學系，但其中國研究不帶有東洋學的色彩，而是強調社會科學的理論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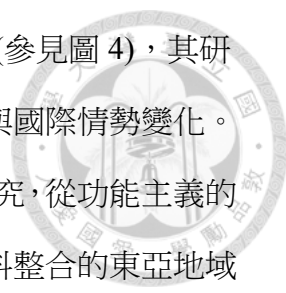
圖 4 毛里和子研究主題歷程圖



資料來源：根據附錄 2 整理⁵⁷

毛里的中國研究受到拉鐵摩爾相當大的啟發，其主張的周邊至中心視角貫徹了其民族研究，此周邊視角若干反映了當時毛里的學術位置。但整理毛里的研究經歷後，可觀察到毛里在學術界從邊緣到漸往核心趨近的軌跡，特別是從與學會無緣的身分到擔任現代中國學會的理事長，以及在文部省重點領域研究「現代中國的構造變動」，統籌近 70 位學者執行研究計畫，之後並在文部科學省 21 世紀 COE「現代亞洲學的創生」，此超過三億日圓的五年大型研究計畫擔任據點領導。此外，在第三章、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檢視毛里的中國民族研究、政治研究與亞

⁵⁷ 以發表相關主題的期刊文章之時間為基準。



洲學的內涵，可觀察到毛里研究課題的取材深受時事因素影響(參見圖 4)，其研究基本上不脫離日本中國研究界的潮流，若干反映出時代需求與國際情勢變化。同時毛里強調的社會科學理論意識與其綜觀性的視野貫徹其研究，從功能主義的強調到提出中國研究的八個途徑與四個模式，最後進入強調學科整合的東亞地域研究，毛里揚棄中國特殊論，不斷試圖透過社會科學理論，特別是比較研究以對象化中國，其參照系並隨著社會主義思潮的衰退，由蘇聯與東歐前共產國家轉移至東亞國家，提出亞洲性的存在，並將中國納入亞洲的範疇裡。且在毛里的認同/民族/亞洲意識建構論述的過程中，其實踐性開始浮現，特別是其對日中關係的見解與亞洲學的提出，揭示出日本學界一直在探討如何面對崛起的中國之道路。

毛里的中國研究也彰顯了其現代主義者色彩，特別是其研究帶有發展史觀、強調實證研究、反對文化特殊論等特質，其發展論與認同普遍價值的結合，體現在毛里對中國民主發展的期待，認為構造變動的結果最終會往民主化道路前進。另一方面，此現代主義特質也使毛里與日本過去研究中國的主流學界(文史學科)間有觀點上的分歧。毛里在大學時期雖專攻歷史學，但她自承無法消除對歷史學本身的懷疑，特別是解釋學的運用。毛里指出即使資料蒐集再完善，所能獲得的真相也僅為冰山一角，或許會有更多無法證實，或是應發生但未發生之事，但解釋分析無法處理此部分。在「現代中國的構造變動」的小組討論會議上，毛里希望歷史小組能夠展開以現在的眼光重新構築歷史的工作，但此研究方式無法被歷史學者所接受。對此毛里表示「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受到了較多的批評，但我堅持認為以這一方法進行分析，將能夠使中國相對化。基於這一想法，與其和專門研究中國的人交往，不如與其他的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學的研究者接觸會更有意思。」(石之瑜等編，2011: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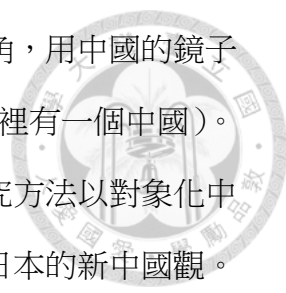
其他日本中國研究者對毛里的中國研究之批評主要集中於其現代主義伴隨之西方式發展觀與研究預設之目的性。除第一章介紹過竹內實對毛里的評價外，村田雄二郎與新免康在毛里的《周縁からの中国》之書評中相繼指出，毛里的研

究並沒有真正的「脫中心化」，而是承繼現有概念(如國家、國民、主權)並預設國民統合的目標。新免康更直指毛里研究的目的性，指出毛里在書中整理之歷史敘述並非源自對事件發展過程之關注，而是為深入理解現今的民族問題，再去挖掘特定相關之史料。(村田雄二郎，1999、新免康，1999)而加加美光行如此評論毛里的《現代中國政治》，「可是他(毛里)自己認為自己採用一種客觀態度，可是他的結論是『中國獨裁，沒有三權分立。』」，「他(毛里)的想法是最後經過什麼樣的路徑能夠實現三權分立，那就他的想法是三權分立是最好的東西的價值觀，並且目的是怎樣實現三權分立，這個有一種主觀的態度……，可是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陳綺齡、邵軒磊，2011:143)

由上述評論反映了非國際政治學門⁵⁸之中國研究者對毛里研究的看法，此在日本中國研究系譜上的意義為何，在此即以加加美光行的研究作為對照。以雙方皆進行過的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為例，毛里提出以「周邊」往「中心」照射，透過研究中共的少數民族照射出中央政府的政治內實「一元政治體制與強力的集權系統」，也是中央與邊境民族衝突之根源。而加加美提出「鏡子」的研究方式，利用少數民族來看中國，相反地也用中國來看少數民族問題，兩者做為鏡子相互對照。藉由研究中國中的少數民族，定義出「做為國家的中國」是什麼？少數民族受國家所管轄，但也反過來決定出國家的實踐權力到哪裡？加加美認為，從少數人的視角來看一個國家，能看出該國家的特殊性，也更能理解其多元性。(陳綺齡、邵軒磊，2011) 對照雙方之研究後可發現，雖毛里與加加美都採取以少數民族觀察中心之研究視角，但在加加美的研究裡，周邊與中心是互動的，相互參照之關係；而在毛里的研究中，周邊是照射出中心實像之「道具」。

此外加加美同樣將此「鏡子」理論運用至日中關係研究與相互認識。加加美肯定竹內好「在現在的日本中看現代中國」，反過來也就是強調「在現代的中國

⁵⁸ 竹內實、村田雄二郎、新免康與加加美光行分為中國文學、中國哲學、東洋史學、現代政治思想研究者。



裡看現在的日本」的方法論，提出「鏡中的日本與中國」的視角，用中國的鏡子照日本（即中國裡有一個日本）、用日本的鏡子照中國（即日本裡有一個中國）。(陳綺齡、邵軒磊，2011)但毛里並不走此途徑而是運用區域研究方法以對象化中國，自過去日中兩國間彼此相互抵抗與掙扎的螺旋解放，展現日本的新中國觀。此差異體現在雙方對方法論主張的不同。毛里與加加美同樣對歐美中心式的區域研究進行反思，但雙方在方法論的選擇上走向不同的道路。在方法上，加加美提倡以國別學前提的「共同行動論」，試圖建立國別學的「中國學」，來取代當前區域研究中的中國研究。而毛里則試圖創設新式的區域研究—由他者研究轉變為自者研究，強調「亞洲性」的價值，建構出能適用於東亞的區域研究理論，並將中國研究納入亞洲學的框架之下。

毛里分別在 2010 年與 2011 年獲得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事處指導的世界中國學論壇頒發之「中國學研究貢獻獎」，及日本文部科學省頒發之「文化功勞者」⁵⁹，此象徵了毛里的研究成果同時受到日中兩國政府的肯定，這是相當罕見的。毛里曾自承由於曾「擔任過幾個大型研究項目代表的經驗，對文部省及學術振興會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石之瑜等編，2011:328)，此間研究者與政府的互動關係值得關注。關於毛里提出「現代亞洲學的創生」之背景，本文第五章整理出時代需求、任職學校要求與條件限制，及中國研究中亞洲參照系的浮現等三點社會環境因素，在這些背景因素下，毛里推動了亞洲學的研究。但即使最初與亞洲學的相遇是被環境所左右，並不意味著研究者自身的能動性消失，探討毛里推動亞洲學的前後過程，發現毛里最初雖不信任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石之瑜等編，2011:336)，也不認同亞洲價值的存在(竹內實、毛里和子，2001:80)。但毛里在執行亞洲學計畫時，指出不存在無法支撐虛構的現實，即使一開始雖為虛構，但透過實踐即可

⁵⁹過去中國政治、東洋史學門獲得此獎的有津田左右吉、吉川幸次郎、宮崎市定、石川忠雄、斯波義信等。而過去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女性學者獲得此獎的只有中根千枝、緒方貞子二人。(日本現代中国学会ニューズレター，第 35 號)

成為真實。此間的轉變可發現毛里自我說服的過程，雖然與亞洲學的遭遇為偶然，但在實踐過程中亞洲就變成其自身的理想。

整體而論，毛里的中國研究從少數民族政策至整體分析中國政治，最後拓展至新亞洲學與西方的區域研究作對話，可發現其研究層次不斷上升，也可觀察到毛里逐漸趨近學術主流的軌跡。同時日本的中國研究也在進行轉型，漸漸從過去的國別學研究，強調中國就是中國，有其特殊性，轉變為以區域研究為主，將中國放置在亞洲的範疇裡，降低了日本單獨面對中國時中國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神聖性，而毛里和子即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參考文獻



一、英文部分

Tomoyuki Kojima, p132-146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Japan", Ash Robert,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2007.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二、中文部分

王勇，2005，〈『東亞共同體』地區與國家的觀點〉，《外交評論》，83，頁 19~29。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

石之瑜，2006，〈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4)，頁 27-34。

石之瑜，2011，〈文明與國際關係理論：亞洲學派的不／可行性〉，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頁331-357。

石之瑜、何培忠、平野健一郎、土田哲夫、村田雄二郎編，2011，《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口述知識史》，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與研究中心。

史達林，1953，《史達林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吳玲君，2007，〈東協國家與東亞經濟合作〉，《問題與研究》，46(2)，頁 117~139。

何培忠，2004a，〈日本中國學研究考察記(三)—訪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毛里和子教授〉，《國外社會科學》，2004(4)，頁 57-60。

何培忠，2004b，〈關於『新亞洲學』〉，《國外社會科學》，2004(6)，頁 91。

何培忠主編，2006，《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大釗，1984，《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澤厚，1996，《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

松本真澄著，魯忠慧譯，2003，〈評日本及歐美學者對中國民族問題之研究〉，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頁17-23。

金少萍，1999，〈日本民族學家對中國大陸的調查與研究〉，《學術探索》，1，

頁68-72。

邵軒磊，2007，〈革命史觀與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之社會主義系譜〉，《中國大陸研

究》，50(4)，頁117-133。

邵軒磊，2009，《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

陸暨兩岸關係與研究中心。

邵軒磊，2012，〈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三期，頁1-26。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衛出版社。

馬場公彥，2004，〈後冷戰時期『東亞』論述的視域——走向開放性區域主義的


幾個嘗試〉，《開放時代》，頁72-88。

徐賁，1996，〈「我們」是誰？—論文化批評中的共同體身分認同問題〉，《東方》，1996年第2期，頁69-73。

郭永興，2004，〈【演講與工作坊紀實4】中國經濟研究在日本〉，《當代中國研

究通訊》，第3期，頁65-66。



- 
- 張友庭，2010，〈民族與歷史——讀拉鐵摩爾和他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頁219-222。
- 陳柏宇，2013，《國際關係的亞洲學派－中國、日本與印度的「再世界化」》，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 陳綺齡、邵軒磊，2011，《加加美光行的中國認識及其學思歷程》，台北：國立台
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 崔蓮，2001，〈近20年來日本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研究文獻簡述〉，《西南民族學院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頁53-62。
- 崔蓮，2003，〈中國少數民族研究在日本--以1949-1979年文獻為中心〉，《西南民
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頁29-38。
-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杜繼東譯，2010，《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
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費孝通，2003，《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黃達遠，2011，〈邊疆、民族與國家——對拉鐵摩爾『中國邊疆觀』的思考〉，《中
國邊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頁33-41。
-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2008，《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葛兆光，2002，〈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臺大歷史學報》，30，
頁183-206。

三、日文部分



川島真、毛里和子，2009，《グローバル中国への道程—外交 150 年》，東京：岩波書店。

毛里和子，1979，〈オウエン・ラティモア考〉，《お茶の水史学》，第 22 期，頁 80-106。

毛里和子，1987，〈中国—国家統合と上からの近代化の中のマイノリティ〉，江口朴郎(編)，《現代世界と民族》，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452-486。

毛里和子，1990a，〈毛沢東時代の中国政治〉，毛里和子(編)，《毛沢東時代の中国》，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頁 1-32。

毛里和子，1990b，〈ソ連・東欧の動きに抱く深い嫌悪感〉，下村満子編，《朝日ジャーナル臨時増刊『変容する社会主義』》，東京：朝日新聞，頁 86-89。

毛里和子，1990c，〈中国の『改革』とシステム変容—天安門事件の意味を問う〉，《現代中国》，第 64 期，頁 4-11。

毛里和子，1990d，〈社会主義諸国の変容と中国—天安門事件とその後〉，野村浩一、宇野重昭、小島晋治、山内一男、岡部達味、竹内実編，《民主化運動と中国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頁 135-149。

毛里和子，1991，〈中国の政治体制の変容—鄧小平時代の意味〉，毛里和子、岡部達味(編)，《改革・開放時代の中国》，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頁 3-38。

毛里和子，1992，〈中国にとっての社会主義—ある中間的評価〉，《国際政治》，

第 99 期，頁 53-68。

毛里和子，1995，〈中国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クライシス—「民族の凝集力」をめぐって〉，毛里和子(編)，《市場経済化の中の中国》，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頁 1-26。

毛里和子，1996，〈『中国人』とはだれか？—民族・台湾・香港問題へアプローチ〉，《中国研究への新しい視座》系列中国領域研究第1號，頁30-35。

毛里和子，1998，《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毛里和子，2000a，〈中国の少数民族問題〉，武田清子(編)，《中国へのかけはし》，東京：宋慶齡日本基金会，頁 97-115。

毛里和子，2000b，〈中国の構造変動と体制変容をめぐって〉，毛里和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 I 大国中国への視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3-14。

毛里和子，2001a，〈中華世界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と再铸造〉，毛里和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7) 中華世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13-49。

毛里和子，2001b，〈地域大国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アジアの 21 世紀——対立と協調》，東京：亜細亜大学アジア研究所，頁 9-37。

毛里和子，2002a，〈中国辺境学のすすめ〉，《EX ORIENTE》，第 6 期，頁 267-283。

毛里和子，2002b，〈辺境学からみた地域・民族・国家〉，中見立夫(編)，《境界を越えて——東アジアの周縁から》，東京：山川出版社，頁190-212。

毛里和子，2002c，〈現代中国研究50年を俯瞰して〉，《学術月報》，2002年第4期，頁369-372。

毛里和子，2003，〈私が研究者になるまで〉，《学術の動向》，2003(1)，頁74-75。

毛里和子，2004a，《新版・現代中国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毛里和子，2004b，〈新たな日中関係を構築する「新思考」のために〉，毛里和子 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東京：岩波書店，頁215-238。

毛里和子，2004c，〈インタビュー ライバル視や脅威論を超えてアジアを『作る』〉 讀賣新聞社《研究の最前線を見る 躍動する早稲田大学の研究活動》，東京：中央公論新社，頁162-171。

毛里和子，2005，〈『東アジア・コミュニティ』にどうアプローチするか?〉，《アジア研究》，51(2)，頁1-5。

毛里和子，2006a，《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東京：岩波書店。

毛里和子，2006b 〈インタビュー 最悪の日中関係 突破口はどこか〉《SIGHT》，28，頁52-66。

毛里和子、森川裕二編，2006，《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4）図説・ネットワーク解析》，東京：岩波書店。

毛里和子，2007a，〈『現代アジア学』への挑戦〉，《アジア経済》，2007(12)，

頁 41-52。

毛里和子，2007b，〈日中関係の再構築のために〉，川島真(編)，《中国の外交》，

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214-238。

毛里和子，2007c，〈「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計する—アジア学のチャレンジ〉，

山本武彦、天兒慧編，《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1)新たな地域形成》，東

京：岩波書店，頁 1-34。

毛里和子，2007d，〈現代アジア学への挑戦をふりかえって〉，《学術の動向》，

2007(6)，頁 13-17。

毛里和子，2007e，〈新日中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地域主義〉，《自由思想》，108，頁

6-22。

毛里和子，2008，〈激流の中にある現代中国にどう迫るか〉，《The humanities

review》，第3期，頁 103-119。

毛里和子編，2010，《中国ポスト改革開放 30 年を考える》，東京：早稲田大

学現代中国研究所。

毛里和子，2012，《現代中国政治第3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毛里和子，2012，〈我的中国研究—三個挑戰〉，〈中国研究的口述知識史工作坊
— 東南亞與日本〉(2012年7月27日)

竹内実、毛里和子，2001，〈対論「大国」中国実像と虚像--竹内実(京都大学名

誉教授)/毛里和子(早稲田大学)〉，《世界》，685，頁 70-80。

早稲田大学COECASオフィス，2005，《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2006》，東京：



早稲田大学COECASオフィス。



村田雄二郎，1999，〈『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書評〉，《国際政治》，121期，頁201-204。

平野健一郎，2007，〈毛里和子さんの人と仕事〉，《自由思想》，108，頁23-26。

堀内賢志，2007，〈COE-CAS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現代アジア学の挑戦』〉，《アジア経済》，2007(6)，頁90-101。

新免康，1999，〈書評『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国際問題》，470期，頁66-69。

四、参考网站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現代中国地域研究 <http://www.china-waseda.jp/>

日本文部科学省 <http://www.mext.go.jp/>

日本現代中国学会 <http://www.genchugakkai.com>

附錄一 毛里和子年表



年份	求學/工作	研究計畫/學會活動	獲獎
1940	出生		
1962	御茶水女子大學畢業		
1965	獲得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學位		
1965	~1987 任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主任研究員		
1981	~1983 任在上海日本國總領事館專門調查員		
1986		~1989 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的調查計畫	
1987	~1994 任静岡縣立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		
1994	~1999 任橫濱市立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	~2004 任亞細亞政經學會理事	每日新聞社亞細亞調查會「アジア太平洋賞大賞」
1996		~1998 文部省重点領域研究「現代中國的構造變動」領域代表	
1997		~1998 任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副理事長	
1999	~2010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	~2001 「21世紀日中關係的展望—日中研究者論壇」代表	大平正芳記念財團「大平正芳賞」
2000		~2002 文部科學省基盤研究A「冷戰史的再檢討」代表	

2002		~2006 文部科學省 21 世紀 COE 「現代亞洲學的創生」據點 領導	
2003			紫綬褒章
2004	獲得早稻田大學政治 學博士學位		
2005		~2006 任現代中國學會理事長	
2006			櫻田會「特別功勞 賞」
2007		~2009 任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人間 文化研究機構「現代中國地 域研究據點計畫」幹事長	7 月 大同生命國際文 化基金「第 22 回 地域研究賞」
			10 月 石橋湛山記念財 團「第 28 回石橋 湛山賞」
2010	退休		9 月 「福岡亞洲文化 賞學術研究賞」
			11 月 世界中國學論壇 「中國學研究貢 獻獎」
2011			日本文部科學省 「文化功勞者」

附録二 毛里和子著作一覽表



専書

出版年月	書名	出版社
1988.2	中国の議会制度と地方自治	東京都議会議会局
1989.5	中国とソ連	岩波書店
1993.9	現代中国政治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8.9	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9.3	現代中国政治を読む	山川出版社[世界史リブレット]
2004.12	新版・現代中国政治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6.6	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	岩波書店
2012.5	第3版・現代中国政治——グローバル・パワーの肖像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編著

出版年月	書名	共同編者/出版社
1986.3	中国社会主義の再検討	山極晃、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1987.3	現代中国とソ連	山極晃、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1990.3	毛沢東時代の中国[現代中国論 1]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1990.10	中ソ関係と国際環境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季刊誌(95)、日本国際政治学会
1991.3	改革・開放時代の中国 [現代中国論 2]	岡部達味、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1994.5	原典中国現代史第一巻	国分良成、岩波書店
1995.4	市場経済化の中の中国 [現代中国論 3]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1996.3	中国の政策決定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00.2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 I 大中国への視座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1.2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VII 中華世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編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4.3	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 ——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	張蘊嶺、岩波書店
2006.12	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④ 図説ネットワーク解析	森川裕二、岩波書店
2007	<i>A New East Asia——Toward a Regional Community</i>	Co-edited by Kenichiro Hiran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9.11	グローバル中国への道程—— 外交 150 年	川島真、岩波書店
2010.2	〈日中学術討論会〉中国ポスト 改革開放 30 年を考える	早稲田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
2012.7	陳情—中国社会の底辺から	松戸庸子、東方書店

期刊論文

出版年月	文章標題	期刊名	巻期/p.數
1968.12	中国共産党の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理論の形成における若干の問題	国際問題研究	(1) , p.1-73
1970.3	長征期のいくつかの問題	国際問題研究	(2) , p.82-99
1970.9	国民革命軍の北伐と中国共産党	お茶の水史学	(1) , p.39-58
1970.12	満州事変とコミンテルン	国際政治	(43) , p.136-154
1973.1	江西ソビエト期の土地革命	アジア研究	(4) , p.50-78
1974.3	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形成	中国共産党史研究の現段階	p.91-104
1974.3	中華ソビエト期	中国共産党史研究の現段階	p.59-90
1974.3	国民革命期	中国共産党史研究の現段階	p.33-58
1974.4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の史的 分析	国際問題	(169) , p.50-63
1975.3	第二次大戦中の中米関係についての一資料	国際問題	(180) , p.36-43

1975.11	中国革命とアジアの冷戦構造	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形 ——1975 年度大会報告集	p.190-201
1976.3	中米関係の新段階と中国外交	国際年報	(14) , p.165-189
1976.12	中国人民解放軍の幹部養成	外務省調査月報	17(3) , p.85-130
1977.3	「天下大動乱」下の中国外交	国際年報	(15) , p.137-160
1977.3	中国国民革命とソ連	中国革命とソ連の顧問たち	p.201-231
1977.9	中国と ASEAN	ASEAN をめぐる国際関係	p.79-114
1978.3	「批林批孔」に揺れる中国	国際年報	(16) , p.131-154
1978.6	中国をめぐる国境問題——概観と展望	共産主義と国際政治	(8) , p.40-65
1978.10	新中国成立前夜の少数民族問題——内蒙古・新疆の場合	講座中国近現代史/第7巻	p.199-241
1979.3	第四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と中国の政情	国際年報	(17) , p.115-142
1979.4	オウエン・ラティモア考(1)	お茶の水史学	(22) , p.80-106
1980.3	四つの近代化と都市住民——住宅問題と雇用失業問題	1980 年代の中国経済	p.189-220
1980.3	第五回非同盟諸国首脳会議	国際年報	(18) , p.53-60
1980.5	緒についたか? 中国の調整政策——北京・上海再訪記	国際問題	(242) , p.84-91
1980.8	中国に政治の嵐の再来はあるか	日中経済協会報	(85) , p.34-39
1980.11	中国の少数民族問題	国際政治	(65) , p.61-85
1981.2	中国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について	共産主義と国際政治	(19) , p.54-71
1981.3	中国共産党の 11 回党大会と新たな不協和音	国際年報	(19) , p.184-204
1981.7	固まる鄧・胡・趙体制	中国経済研究月報	p.1-18

1981.7	新疆の「地方民族主義」をめぐる問題	論集中国近代研究	p.381-407
1982.2	中国政治における「幹部」問題	現代中国政治の構造	p.162-200
1982.10	現地で見えた中国内政と日中関係(日中関係の10年)	国際問題	(271)・p.42-53
1983.8	中国から見たソ連・東欧の経済改革	共産主義と国際政治	(29)・p.2-16
1984.2	鄧胡体制下の政治と経済の展開	国際問題	(287)・p.20
1984.3	中国都市部の雇用問題——「中国社会主義論」への一つの視角	中国の政治と国際関係——国際関係論のフロンティア	p.257-280
1984.6	都市労働力事情	中国経済の中長期展望	p.139-158
1984.7	中国都市部の失業問題	中国人口統計研究論集——昭和58年中国人口統計研究会報告	p.41-51
1985.3	中国——動き始めた「四つの近代化」	国際年報	(21)・p.156-180
1985.6	「整党」と9月全国党代表会議	中国経済	p.30-44
1985.7	21世紀への「第2の社会革命」——エリート学生300人にみる意識調査(中国の挑戦)	エコノミスト	p.110-114
1986.2	アジア太平洋に向かう中国の眼	国際問題	(311)・p.43-55
1986.3	中国のソ連経済評価	中国社会主義の再検討	p.265-280
1986.3	中国の経済体制改革——ハンガリーとの比較から	中国社会主義の再検討	p.73-112
1986.3	文化大革命期経済の諸特徴——経済の軍事化を中心に	現代中国のゆくえ——文化大革命の省察Ⅱ	p.55-78
1986.10	科学技術と中国外交	国際政治	(83)・p.91-106
1986.11	財政体制から見た中国の地方と中央	中国政治の中長期展望	p.202-217

1987.3	中ソ対立の構造——対立の20年をどう評価するか	現代中国とソ連	p.101-139
1987.8	中国——国家統合と上からの近代化の中のマイノリティ	現代世界と民族	p.452-486
1987.11	よみがえる分断民族の交流——新疆ホルゴスから中ソ国境を見る	世界	p.102-110
1987.12	中国とASEAN——猜疑から協力へ	ASEANの二十年	p.143-166
1988.2	中ソ・デタントはどこまで進むか	世界	p.102-109
1988	「Sino-Soviet Relations: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i>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i>	p.42-66.
1988.8	中国における政治体制改革	変動期の国際社会	p.192-235
1988.10	「The Impact of Sino-Soviet Détente」	<i>The Pacific Review</i> , Oxford Univ. Press,	1(3)・ p.290-295.
1989.7	「新思考」がリードした中ソ・サミット(中・ソ激動のゆくえ)	世界	p.168-171
1989.8	江蘇省における農村労働力の移転	NIRA 研究叢書	p.54-64
1989.8	全国経済の中の江蘇省	NIRA 研究叢書	p.15-25
1989.9	政治体制の特徴とその改革	現代中国の政治世界	p.55-95
1989.9	中ソ和解と危機のなかの2つの改革(中ソ和解と国際関係<焦点>)	国際問題	p.17-31
1989.10	知識人と政治——厳家其の場合	東亜	p.9-22
1990.3	社会主義諸国の変容と中国——天安門事件とその後	民主化運動と中国社会主義	p.135-149
1990.3	1970年代末までの中央と地方	毛沢東時代の中国〔現代中国論1〕	p.87-112
1990.3	毛沢東時代の中国政治	毛沢東時代の中国〔現代中国論1〕	p.1-33
1990.6	ソ連・東欧の動きに抱く深い嫌悪感	変容する社会主義	p.86-89

1990.8	中国の「改革」とシステム変容——天安門事件の意味を問う	現代中国	p.4-11
1990.10	劉曉大使のモスクワ日記——1955年～62年	国際政治	p.177-204
1990.10	社会主義の変容と中ソ関係研究の新しい視角	国際政治	p.1-15
1991.1	低迷する中国政治——天安門から1年半	国際問題	p.2-13
1991.3	中国の政治体制の変容——鄧小平時代の意味	改革・開放時代の中国〔現代中国論2〕	p.3-38
1991.10	中国・実利主義の危うさ——経済開放に社会主義の活路を求めるが...	世界週報	p.24-29
1991.11	さまざまな「脱社会主義」	世界	p.164-171
1992.3	中国にとっての「社会主義」——ある中間的評価	国際政治	(99)・p.53-68
1992.4	毛沢東政治の起点——百花斉放・百家争鳴から反右派へ	孫文と毛沢東の遺産	p.287-346
1992.5	「脱南入北」をめざす中国	東洋経済	p.50-54
1994.3	中国・アジアの「人権外交」批判	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人権概念の考察	p.28-37
1994.3	中国・アジアの「人権外交」批判	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人権概念の考察	p.28-37
1994.3	国際環境としての中ソ関係	20世紀の中国——政治変動と国際契機	p.186-203
1994.5	毛沢東型社会主義の形成	原典中国現代史	p.124-185
1994.5	社会主義中国の出発から百花斉放・百家争鳴へ	原典中国現代史	p.69-122
1994.5	全体解説、建国期の政治	原典中国現代史	p.1-68
1994.6	中国の社会主義選択と国際環境	東アジアと冷戦	p.259-283
1994.6	冷戦と中国	東アジアと冷戦	p.85-109
1994.11	社会主義の変容——中国とロシア	講座現代アジア 3:民主化と経済発展	p.45-76
1995summer	「China's Pivotal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Community」	<i>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i>	3(9)・p.228-234.

1995.1	世界システムのなかの中国	国際問題	(418)・p.2-16
1995.3	中国の対ロシア外交(1992-94年)	ロシア連邦極東地域研究	p.84-94
1995.3	中国の人権議論と自己認識	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人権概念と人権状況	p.42-52
1995.4	中国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クライシス	市場経済化の中の中国〔現代中国論3〕	p.1-26
1995.5	中国とロシア——同盟から対立、そして新パートナーへ	スラブの国際関係	p.260-285
1995.5	「鄧小平後」の始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期3回会議を終えて	中国経済	p.16-30
1995.11	改革・開放時代の中国外交——外交思想を中心に	グレーター・チャイナの政治変容	p.121-149
1996.2	社会主義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中国の場合	比較法研究	(57)・p.156-160
1996.3	重要文書作成にみる中国の政策形成——趙紫陽時代と江沢民時代	中国の政策決定	p.37-51
1996.3	中国の人権状況——わずかな前進・重い課題	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人権の総合的研究	p.36-47
1996.3	不定形のアジア——中国は「脅威」か？	世界	p.41-48
1996.8	「中国人」とはだれか？——民族・台湾・香港問題へアプローチ	中国研究への新しい視座	p.30-35
1996.8	学際研究・比較研究のあなたに	中国研究への新しい視座	p.1-5
1996.9	対中央アジア・モンゴル関係	中国総覧	p.151-157
1996.9	対ロシア関係	中国総覧	p.141-150
1997.2	現代中国の人権：二つの伝統・二つの国権主義	現代中国：歴史的連続性と不連続性	p.38-49
1997.3	日本にとっての中国	中国の21世紀	p.291-308
1997.4	Who is 「Chinese」？——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s Of Nationality, Taiwan, and Hong Kong	<i>New Horizon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Study</i>	p.42-49

1997.8	中国の人権——強まる国権主義のなかで	国際問題	(449)・p.32-44
1997.11	学界展望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の40年	アジア経済	38(11)・p.68-74
1998.2	中国の北方外交——ロシア、中央アジア、モンゴル	中国の今後を考える	p.108-121
1998.3	1940年代内外モンゴル統一の試み	横浜市立大学論叢	49(2/3)・p.299-327
1998.9	対中央アジア・モンゴル関係	中国総覧	p.160-165
1998.9	対ロシア関係	中国総覧	p.150-159
1999.1	中国の構造変動を見つめて	日中文化研究	(14)・p.120-125
1999.3	改革開放期の中央・地方関係分析のために	中国の中央・地方関係	p.1-10
1999.3	中国の「構造変動」と体制変容をめぐって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をめぐって	p.55-59
1999.9	中国研究——地方の時代を迎えて	アジア研ワールド・トレンド	(49)・p.1
1999.11	ポスト冷戦と中国の安全保障観——協調的安全保障をめぐって	国際安全保障の新展開	p.32-49
2000.2	中国はどこへ行く——近代化への三つの課題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 I 大国中国への視座	p.269-296
2000.2	中国の構造変動と体制変容をめぐって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 I 大国中国への視座	p.3-14
2000.9	中国の少数民族	中国へのかけはし	p.97-115
2000.10	中国 1986-89年——民主化の夭折と国際環	国際政治	(125)・p.14-30
2000.11	対中央アジア・モンゴル関係	中国総覧	p.154-160
2000.11	対ロシア関係	中国総覧	p.144-153
2001.2	中華世界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と再鑄造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VII 中華世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編	p.13-49
2001.3	地域大国中国とどうつきあうか	アジアの21世紀——対立と協調	p.9-37
2001.4	情報の公開と民主主義	学術の動向	p.50-53

2001.12	残存的冷战思维	越洋聚焦——日本论坛	p.15-16
2002.3	辺境学から見た地域・民族・国家	境界を越えて——東アジアの周縁から	p.190-212
2002.3	中国辺境学のすすめ	EX ORIENTE	(6)・p.267-283
2002.3	「Integrative and Disruptive For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China Report</i>	(38)・p.385-396.
2002.4	現代中国研究 50 年を俯瞰して	学術月報	p.369-372
2002.11	人文社会科学の振興のために——虚学と実学	学術月報	p.1020-102.
2003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Its Non-East Asian Factors」	<i>COE-CAS Working Paper</i>	(3)・p.1-11
2003	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与非东亚要	世界经济与政治	p.52-57
2003.1	16 回党大会と中国政治の今後	国際問題	(514)・p.2-16
2003.1	私が研究者になるまで	学術の動向	p.74-75
2003.4	巨大にして普通の国・中国——共生の関係をどう築くか？	新鐘	(67)・p.50
2003.4	中国政治の変容——16 回党大会と今後	最近の世界の動き	p.1-8
2003.8	日本的現代中国研究的代表作	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	p.282-291
2004.2	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中国——移行期の観察	早稲田政治経済学雑誌	(354)・p.14-20
2004.3	総括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	(50)・p.279-282
2004.3	新たな日中関係を構築する「新思考」のために	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	p.217-238
2005.3	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中国——「帝国論」の視角から	現代中国研究	(16)・p.20-29
2005.3	地域は作られる——「東アジア共同体」をめぐって (特集 波立つ日中関係)	論座	(118)・p.88-93

2005.4	「東アジアコミュニティ」に どうアプローチするか？	アジア研究	51(2) , p.1- 5
2005.6	中国のアジア地域外交——上 海協力機構と「東アジア安全 保障共同体」をめぐって	アジア太平洋連帯構想	p.229-246
2005.7	「東アジア共同体」と中国の 地域外交	地域主義の国際比較	p.65-82
2006	「Creating Regions: A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y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i>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i>	(1) , p.69-76.
2006.3	新段階の日中関係と東アジア	中国外交(史) 研究への 視座	p.5-14
2006.5	東アジア共同体と中国	国際問題	(551) , p.4- 14
2007.3	「Designing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Challenges to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i>COE-CAS Working Papers</i>	(46) , p.1-19.
2007.3	「New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 Gloomy,Frail Rivalry」	<i>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i>	(2) , p.1-77.
2007.5	日中関係、新たな枠組みが不 可欠	日本経済研究センター 会報	(955) , p.18- 21
2007.6	「現代アジア学」への挑戦を ふりかえって	学術の動向	p.13-17
2007.6	総論 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計 する——現代アジア 学への チャレンジ	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 1 新たな地域形成	p.1-34
2007.8	日中関係の再構築のために	中国の外交——自己認 識と課題	p.214-238
2007.9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のための覚 え書	アジア太平洋論叢	(17) , p.180- 190
2007.11	競争・拠点型研究の功罪 ——21 世紀 COE との苦しか った 5 年間	図書	p.14-17
2007.11	新日中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地域 主義——戦後から新時代へ	自由思想	(108) , p.6- 22

2007.12	現代アジア学への挑戦——21世紀 COE を振り返って	アジア経済	48(12)・p.41-52
2008.1	現代中国地域拠点が始動	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	(3)・p.68-71
2008.5	東アジアの新情勢と日中関係	民主主義教育 21	p.206-215
2008.5	中国は「平和的崛起」に向かうのか キーワードで読む中国外交	外交フォーラム	p.23-27
2008.11	激流の中にある現代中国にどう迫るか	論壇 人間と文化	(3)・p.102-119
2008.11	学としての「地域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北東アジア研究交流ネットワーク 年報	(2)・p.6-11
2009.2	国交正常化でなにが「正常化」したのか	週間昭和	(8)・p.5-6
2009.4	「動く中国」と「変わらない中国」——現代中国研究のパラダイム・シフトを考える	アジア研究	55(2)・p.70-84
2009.11	グローバル中国への道程——外交 150 年」(第 7-10 章、おわりに	グローバル中国への道程——外交 150 年 [叢書中国的問題群 12]	p.101-188
2009.12	中国の改革開放 30 年を評価する——制度化の視点から	ロシア・ユーラシア経済——研究と資料	p.105-117
2010.1	現代中国研究 40 年——三つの挑戦	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	(7)・p.30-35
2010.1	現代中国 60 年をどう見るか——パラダイム・シフトを考える	中国研究月報	(743)・p.12-27
2010.2	「改革開放 30 年」をどう評価するか	中国ポスト改革開放 30 年を考える日中学術討論会	p.20
2010.4	中国のアジア地域外交——上海協力機構を中心に	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	p.265-288
2010.5	「自由化」と高まる社会的緊張	中国年鑑 2010	p. 38-42
2010.6	現代アジア政治学のススメ	アジア学のすすめ 第 1 巻 アジア政治・経済論	p. 108-122

2010.12	日中関係の現状から未来を展望する——「新日中関係は？」	季刊 中国	(103)・2010年冬季号、p. 49-63
2010.12	地域研究と国際関係学のあいだ——中国研究の立場から	国際関係論のニューフロンティア	p.218-241
2010.12	日中間の歴史共同研究交流を豊かにするために	戦争を知らない国民のための日中歴史認識——『日中歴史共同研究〈近現代史〉』を読む	p. 135-148
2011.3	日中関係与大平正芳	中日関係与大平正芳	p. 20-27
2011.7	アジアにおける冷戦構造の変容と地域紛争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9 経済発展と民主革命	p. 95-120
2011.8	世紀の実験——「中国モデル」をどう考えるか	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	p. 10-18
2012	データから解析する中国共産党の変身	中国共産党のサバイバル戦略	p. 40-59
2013	重建日中関係	日本學刊	(4)